



12 則

大法官關於人權保障、男女平權之重要解釋



Constitutional Court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01~41

English43~114

日文115~167



序

中華民國（台灣）為自由民主法治國家，以人權立國。職司釋憲權之司法院大法官（相當於外國憲法法院法官），本於維護憲政秩序及保障人權最後防線之理念，已作成許多重要解釋，就自由民主法治國形象之提昇，具正面意義，於國際社會上亦已建立風向指標地位。

為使國際社會了解我國就人權保障及男女地位平等維護之努力與成果，司法院在眾多解釋中，特選擇12則，做為代表。並將解釋公布後，影響相關法令修正之情形，同時以中英日三國語文編印成冊，以便於關心人權保障及男女平等之國際人士閱讀參考。

翁岳生

民國96年9月於司法院



目次

序	02
1. 司法院釋字第365號解釋 (1994.9.23)	04
2.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 (1995.7.28)	06
3. 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 (1995.12.22)	10
4. 司法院釋字第436號解釋 (1997.10.3)	14
5. 司法院釋字第445號解釋 (1998.1.23)	18
6. 司法院釋字第452號解釋 (1998.4.10)	22
7. 司法院釋字第457號解釋 (1998.6.12)	24
8. 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 (1998.12.18)	26
9.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 (2001.12.14)	29
10. 司法院釋字第556號解釋 (2003.1.24)	33
11. 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 (2004.12.30)	35
12.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 (2005.9.28)	38

本案爭點：民法就親權行使父權優先之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民法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與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應予修正，並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員因應本號解釋，於1996年5月31日提出民法親屬編第1089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審議。嗣立法院於1996年9月6日審議通過，9月25日總統以(85)華總(一)義字第850023184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89條，將原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修正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第2項)。



解釋文

民法第1089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7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5項（現為第10條第6項）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 (1995.7.28)

本案爭點：檢肅流氓條例強制到案、秘密證人等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檢肅流氓條例關於授權警察機關得逕行強制人民到案；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有再受感訓處分之虞；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並予告誡之處分，人民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等規定，均與憲法意旨相違，應至遲於85年(1996年)12月31日失其效力。

行政院為因應本號解釋，於1996年8月19日提出檢肅流氓條例第5條至第7條、第12條、第21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嗣立法院於同年12月30日審議通過，同日總統以(85)華總(一)義字第850030731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該條例，第5條原關於人民對警察機關認定其為流氓並予告誡之處分，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規定，修正為於不服聲明異議之決定時，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第6條、第7條原關於授權警察機關得逕行強制人民到案之規定，改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法院核發拘票，僅於特殊情形下，得逕行拘提，惟仍應即報請法院核發拘票，如法院不核發時，應即予釋放；第12條原關於被移送裁定人不得要求與證人對質詰問之規定刪除；第21條原關於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有再受感訓處分之虞之規定，修正為感訓處分期間得與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相互折抵。





解釋文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相關之條件。檢肅流氓條例第6條及第7條授權警察機關得逕行強制人民到案，無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第12條關於秘密證人制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並妨礙法院發見真實；第21條規定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無論有無特別預防之必要，有再受感訓處分而喪失身體自由之虞，均逾越必要程度，欠缺實質正當，與首開憲法意旨不符。又同條例第5條關於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並予





告誡之處分，人民除向內政部警政署聲明異議外，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亦與憲法第16條規定意旨相違。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中華民國85年12月31日失其效力。



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 (1995.12.22)

本案爭點：刑訴法檢察官羈押權、提審法提審要件等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官有關羈押被告之各項處分權之規定，以及提審法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條件，均與憲法有所違背，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行政院與司法院為因應本號解釋，於1997年5月10日會銜提出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5條第3項、第121條第1項、第259條第1項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司法院亦同日提出提審法第1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均送請立法院審議。此外，部分立法委員亦提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送請審議。案經立法院先後審議通過後，總統於同年12月19日以(86)華總(一)義字第8600272590號令，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1999年12月15日以(88)華總(一)義字第8800299070號令，修正公布提審法。



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就羈押之要件及理由設更明確且嚴謹之規定，並明定由法官為之(第1、2項)；第102條增列押票應由法官簽名之規定(第4項)；第105條原賦予檢察官核准押所長官命令之權，改由法院行之，急迫時，檢察官或押所得先為必要處分，惟應即陳報法院核准(第3項)；第121條第1項原賦予檢察官關於羈押被告(犯罪嫌疑人)之各項處分，均改由法院行之；並於第259條第1項明定，羈押之被告受不起訴處分者，視為撤銷羈押，檢察官應將被告釋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至提審法部分，刪除其第1條原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條件之規定。





解釋文

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憲法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自非僅指同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之廣義司法機關。

憲法第8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理之訊問，其無審判權者既不得為之，則此兩項所稱之「法院」，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法院以外之逮捕拘禁機關，依上開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應至遲於24小時內，將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3項準用第71條第4項及第120條等規定，於法院外復賦予檢察官羈押被告之權；同法第105條第3項賦予檢察官核准押所長官命令之權；同法第121條第1項、第259條



第1項賦予檢察官撤銷羈押、停止羈押、再執行羈押、繼續羈押暨其他有關羈押被告各項處分之權，與前述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均有不符。

憲法第8條第2項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24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24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並未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前提要件，乃提審法第1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條件，與憲法前開之規定有所違背。

上開刑事訴訟法及提審法有違憲法規定意旨之部分，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本院院解字第4034號解釋，應予變更。至於憲法第8條第2項所謂「至遲於24小時內移送」之24小時，係指其客觀上確得為偵查之進行而言。本院釋字第130號之解釋固仍有其適用，其他若有符合憲法規定意旨之法定障礙事由者，自亦不應予以計入，併此指明。



司法院釋字第436號解釋 (1997.10.3)

本案爭點：軍事審判法相關規定是否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軍事審判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又為保障人身自由及訴訟權，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與憲法意旨不符之規定，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行政院與司法院為因應本號解釋，於1999年3月29日會銜提出軍事審判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嗣立法院於同年10月1日審議通過，10月2日總統以(88)華總(一)義字第880023438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軍事審判法全文修正，依本號解釋意旨重建軍事審判機關，以符憲法關於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全文共8編計238條。於總則編(第1編)修正重點有：軍法機關改採地區制，不再隸屬部隊，國防部設「地方」、「高等」、「最高」三級軍事法院，並明定其組織及管轄；國防部對於軍法行



政事項之監督，不得影響審判權之行使；縮小視同現役軍人之範圍；修正現役軍人定義；強化軍法人員身分保障等(以上第1章至第3章)；厲行審檢分立，明定各級軍事法院配置之檢察署獨立行使職權(第4章)；取消軍事檢察官之羈押權，移由軍事法院職掌，並參酌刑事訴訟法，增訂保障人權相關措施(第5章至第10章)；增訂證據專章，以發揮證據裁判主義之功能(第11章)。此外刪除原第11條所定國防部為最高軍事審判機關、第13條及第34條關於軍官參與審判、第133條關於軍事長官判決核定及覆議權、第158條關於審判庭組成須簽請軍事長官核定等規定，以貫徹審判獨立。

又關於偵查、起訴、審判、上訴、抗告、再審、非常上訴，以及執行程序(第2編至第7編)，均依解釋意旨，多所修正。其中關涉解釋所指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乙節，增訂不服最高軍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或高等軍事法院宣告死刑、無期徒刑之上訴判決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最高法院(第181條)。





解釋文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16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亦為人民，自應同受上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9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77條、第80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77條之意旨，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11條，第133條第1項、第





3項，第158條及其他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有關機關應於上開期限內，就涉及之關係法律，本此原則作必要之修正，並對訴訟救濟相關之審級制度為配合調整，且為貫徹審判獨立原則，關於軍事審判之審檢分立、參與審判軍官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事項，亦應一併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司法院釋字第445號解釋 (1998.1.23)

本案爭點：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集會遊行法關於不予許可集會之部分要件規定，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均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行政院為因應本號解釋，於2000年10月17日提出集會遊行法第6條、第9條、第11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嗣立法院於2002年6月4日審議通過，6月26日總統以(91)華總(一)義字第0910012808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集會遊行法，修正第9條第1項但書，對於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申請集會遊行，不受6日前申請之限制，以保障人民偶發性集會遊行之自由；修正第11條關於室外集會遊行不予許可情事之概括規定，予以具體明確化；刪除同條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不予許可之規定，以保障參與者表達政治意見之自由。



解釋文

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11條規定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

集會遊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除同條項但書所定各款情形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同法第11條則規定申請室外集會、遊行除有同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應予許可。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抵觸。

集會遊行法第11條第1款規定違反同法第4條規定者，為不予許可之要件，乃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





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同條第2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虞者」，第3款規定：「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有欠具體明確，對於在舉行集會、遊行以前，尚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僅憑將來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會、遊行准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集會遊行法第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禁制區，係為保護國家重要機關與軍事設施之安全、維持對外交通之暢通；同法第10條規定限制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之資格；第11條第4款規定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為不許可集會、遊行之要件；第5款規定未經依法設立或經撤銷許可或命令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申請者得不許可集會、遊行；第6款規定申請不合第9條有關責令申請人提出申請書填具之各事項者為不許可之要件，係為確保集會、遊行活動之和平進行，避免影響民



眾之生活安寧，均屬防止妨礙他人自由、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規定並無牴觸。惟集會遊行法第9條第1項但書規定：「因天然災變或其他不可預見之重大事故而有正當理由者，得於2日前提出申請。」對此偶發性集會、遊行，不及於2日前申請者不予許可，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自由之意旨有違，亟待檢討改進。

集會遊行法第29條對於不遵從解散及制止命令之首謀者科以刑責，為立法自由形成範圍，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尚無牴觸。



司法院釋字第452號解釋 (1998.4.10)

本案爭點：民法關於夫妻住所以單方意思決定之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民法關於夫妻住所以單方意思決定之規定，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形，與憲法意旨不符，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

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員先於1997年12月20日提出民法親屬編第1002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嗣解釋公布，立法院依解釋意旨，於1998年5月28日審議通過，6月17日總統以(87)華總(一)義字第870012130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02條，將原以夫妻單方意思決定住所之規定，修正為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定之，未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之。



解釋文

民法第1002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者，從其約定。本條但書規定，雖賦予夫妻雙方約定住所之機會，惟如夫或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上開法律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又夫妻住所之設定與夫妻應履行同居之義務尚有不同，住所乃決定各項法律效力之中心地，非民法所定履行同居義務之唯一處所。夫妻縱未設定住所，仍應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居之義務，要屬當然。



司法院釋字第457號解釋 (1998.6.12)

本案爭點：退輔會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禁出嫁女繼承之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國有農場土地配耕予榮民，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其繼承之權利，女兒出嫁後則無條件收回，與男女平等原則有違，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6個月內，檢討處理。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1998年12月16日依解釋意旨發布「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亡故後其遺眷申辦繼耕作業要點」，並廢止「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

上開新發布之要點依解釋意旨明定，配耕榮民亡故，得申辦繼耕間接安置之遺眷，其範圍為特定條件下之配偶、成年子女及養子女(第3點)；並刪除原要點關於女兒出嫁後無條件收回配耕地之規定。



解釋文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7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國家機關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亦應遵循上開憲法之規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布之「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固係基於照顧榮民及其遺眷之生活而設，第配耕國有農場土地，為對榮民之特殊優惠措施，與一般國民所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間。受配耕榮民與國家之間，係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配耕榮民死亡或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主管機關原應終止契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合理運用。主管機關若出於照顧遺眷之特別目的，繼續使其使用、耕作原分配房舍暨土地，則應考量眷屬之範圍應否及於子女，並衡酌其謀生、耕作能力，是否確有繼續輔導之必要，依男女平等原則，妥為規劃。上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第4點第3項：「死亡場員之遺眷如改嫁他人而無子女者或僅有女兒，其女兒出嫁後均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如有兒子准由兒子繼承其權利」，其中規定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其所謂繼承之權利，與前述原則不符。主管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6個月內，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規定檢討，妥為處理。



司法院釋字第471號解釋 (1998.12.18)

本案爭點：槍砲條例強制工作處分之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關於一律宣付強制工作3年之規定，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者之身體自由部分，不合憲法之比例原則，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因應本號解釋，法務部於1999年1月26日函令所屬檢察機關，應審核解釋公布前，經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付強制工作3年確定之案件，是否合於憲法之比例原則，如有不符，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或免予繼續執行。

另行政院亦於2000年11月14日提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嗣立法院於2001年10月31日審議完成，11月14日總統以(90)華總(一)義字第9000223470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該條例，刪除原第19條強制宣付保安處分之規定。



解釋文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設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犯第7條、第8條、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第13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此項規定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3年，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23條所定之比例原則。犯上開條例第19條所定之罪，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





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3年之部分，與本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犯該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列舉之罪，依個案情節符合比例原則部分，固應適用該條例宣告保安處分；至不符合部分而應宣告保安處分者，則仍由法院斟酌刑法第9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依職權為之，於此，自無刑法第2條第2項之適用，亦即仍有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 (2001.12.14)

本案爭點：警察勤務條例實施臨檢之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臨檢之實施手段，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通盤檢討訂定。

內政部警政署於解釋公布後，立即傳真解釋文予各警察機關，要求執行臨檢、路檢、盤查等勤務之警察人員，應著制服並出示證件、告知事由；對於臨檢之要件及程序，務求嚴謹，講究執法技巧與態度，提升執法品質；此外，訂定「警察實施臨檢作業規定」、「警察實施臨檢標準作業程序」，以提供更為明確之程序依據，並舉行相關實務講習會。

另解釋所指法規欠完備部分，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員於2002年5月29日提案制定警察職權行使法，行政院亦於同年12月13日提出警察職務執行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嗣立法院二案併審，於2003年6月5日審議通過，名稱定為「警察職權行使法」，6月25日總統以(92)華總(一)





義字第09200116580號令制定公布。

制定公布之警察職權行使法共5章計32條，就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之救濟，均予以明確規範。首先揭明其制定目的在使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並規範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必要限度，應以侵害最少之方法為之，且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告知事由等(第1章)；次就查證人民身分及資料蒐集事項、於突發危險狀態實施即時強制事項，明確規範其要件及程序(第2章、第3章)；末則明定人民於警察行使職權認有侵害其利益時之救濟權利(第4章)。本法公布創警察行使職權法制化之新猷。





解釋文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11條第3款，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11條第3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司法院釋字第556號解釋 (2003.1.24)

本案爭點：組織犯罪條例「參與犯罪組織」之意涵？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是否仍在繼續中，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若在參與行為未發覺前自首，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繼續參與。相關解釋應予變更。

司法院釋字第68號、第129號及院字第667號解釋，關於參加犯罪組織是否繼續及對舉證責任分擔之釋示應予變更，相關案例裁判嗣後不再援用。





解釋文

犯罪組織存在，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即有受侵害之危險，自有排除及預防之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乃以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達成維護社會秩序及保障個人法益之目的。該條例第3條第1項及第3項所稱之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至其行為是否仍在繼續中，則以其有無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為斷，此項犯罪行為依法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若組織成員在參與行為未發覺前自首，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繼續參與。本院釋字第68號解釋前段：「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係針對懲治叛亂條例所為之釋示，茲該條例已經廢止，上開解釋併同與該號解釋相同之本院其他解釋（院字第667號、釋字第129號解釋），關於參加犯罪組織是否繼續及對舉證責任分擔之釋示，與本件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予變更。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所為過渡期間之規定，其適用並未排除本解釋前開意旨，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並無抵觸。



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 (2004.12.30)

本案爭點：民法及判例禁子女提否認生父之訴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法未規定子女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及提起該訴之期間及起算日，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應檢討改進。

本號解釋公布後，行政院與司法院於2006年4月20日會銜提出民法親屬編第1063條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同年4月19日部分立法委員亦提出相關修正草案。嗣立法院併案審查，於2007年5月4日審議完成；5月23日總統以(96)華總(一)義字第09600064111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公布之民法第1063條，賦予子女亦有權提起否認其為婚生子女之訴（第2項）。





解釋文

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1063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1年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使子女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3473號及同院75年台上字第2071號判例與此意旨不符之部分，應不再援用。有關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算日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以符前開憲法意旨。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或判例，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



意旨不符時，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基礎，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業經本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釋闡釋在案。本件聲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以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其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否認子女之訴部分之相關規定，至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起訴者，應為子女之利益為之。

法律不許親生父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係為避免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家庭之和諧及影響子女受教養之權益，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於將來立法是否有限度放寬此類訴訟，則屬立法形成之自由。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 (2005.9.28)

本案爭點：戶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捺指紋始核發身分證規定違憲？

解釋摘要及法令修正情形

解釋意旨宣告，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戶籍法關於形同強制捺錄指紋之規定，於憲法之意旨未合，均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關於戶籍法第8條，行政院曾於2005年4月11日提出修正草案刪除第2項、第3項，送請立法院審議，惟立法院未審議通過。

嗣本號解釋公布，內政部即依解釋意旨刪除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捺指紋之相關規定，並刪除全面換證須捺錄指紋之相關作業規定；2005年12月21日開始辦理全面換證作業，未捺錄指紋。

至前開戶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修正草案，其修正方向(刪除第2項、第3項)與本號解釋意旨相符；解釋公布後，內政部積極協調立法院審議修正，以保障基本人權。



解釋文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3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料，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國民身分證發給與否，則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戶籍法





第8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14歲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滿14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第3項規定：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對於未依規定捺指紋者，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形同強制捺指紋並錄存指紋，以作為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其目的為何，戶籍法未設明文規定，於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已有未合。縱用以達到國民身分證之防偽、防止冒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迷途失智者、無名屍體等目的而言，亦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不符比例原則之要求。戶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強制人民捺指紋並予錄存否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規定，與憲法第22條、第23條規定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至依據戶籍法其他相關規定換發國民身分證之作業，仍得繼續進行，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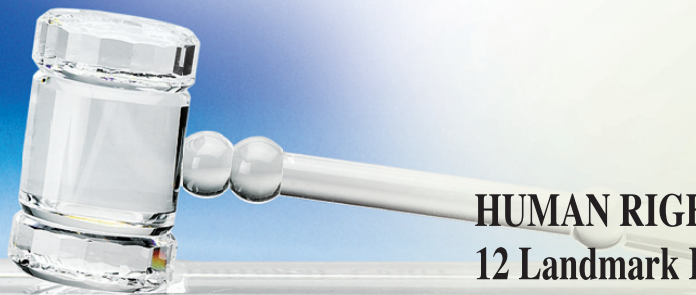
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其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





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 GENDER EQUALITY:
12 Landmark Interpretations Issued by the Justices**

Constitutional Court Republic of China





FORE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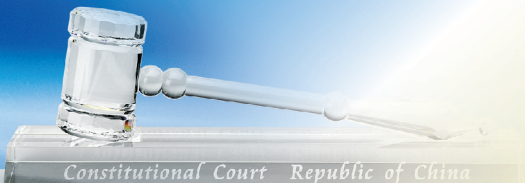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nation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which embraces freedom,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The Justices of the Judicial Yuan (who are equivalent to judges of a foreign constitutional court) have given numerous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their ideas of serving as the final line of defens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se interpretations have struck a positive note in improving the nation's image as a free, democratic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ed their landmark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hel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come aware of the nation's efforts and accomplish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the Judicial Yuan has selected twelve representative interpret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is ready to publish a booklet containing such interpretations along with their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will be printed not only in Chinese, but also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reference by foreign reader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Yueh-sheng Wong

September 2007





CONTENTS

FOREWORD	44
1. J.Y. Interpretation No. 365 (September 23, 1994)	46
2. J.Y. Interpretation No. 384 (July 28, 1995)	49
3. J.Y. Interpretation No. 392 (December 22, 1995)	54
4. J.Y. Interpretation No. 436 (October 3, 1997)	62
5. J.Y. Interpretation No. 445 (January 23, 1998)	69
6. J.Y. Interpretation No. 452 (April 10, 1998)	76
7. J.Y. Interpretation No. 457 (June 12, 1998)	80
8. J.Y. Interpretation No. 471 (December 18, 1998)	85
9. J.Y. Interpretation No. 535 (December 14, 2001)	90
10. J.Y. Interpretation No. 556 (January 24, 2003)	98
11. J.Y. Interpretation No. 587 (December 30, 2004)	103
12. J.Y. Interpretation No. 603 (September 28, 2005)	108



J.Y. Interpretation No. 365 (September 23, 1994)

Issue: Article 1089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that in case of parental disagreement in exercising parental rights over a minor, the father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s the provision of said Article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365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Civil Code, in stipulating that in situations of parental disagreement in exercising parental rights over that of a minor the father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s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Amendments thereto, which aim to eliminate sexual discrimination. This Article should be examined and amended and shall be void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y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responded to said Interpretation by proposing a bill to amend certain articles of the Civil Code, Part IV Family, including Article 1089 thereof, on May 31, 1996. Later on, the Legislative Yuan deliberated and passed the relevant amend-



ments on September 6, 1996, which were then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on September 25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85)-Hua-Zong-(1)-Yi-8500231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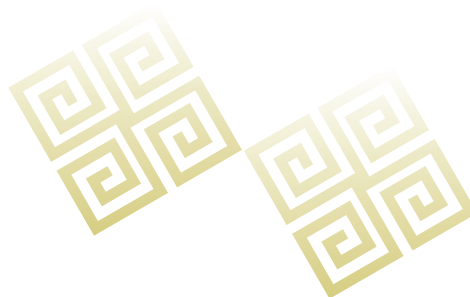
Instead of stipulating that the father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case of parental disagreement in exercising parental rights over a minor, the newly amended Article 1089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that where there is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arent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in regard to the grave events of the minor child, they may petition the court for a dec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aragraph II).





Holding

Article 1089 of the Civil Code, which stipulates that in situations of parental disagreement in exercising parental rights over that of a minor the father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Article 7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proclaims that both sexes are equal under the law, as does Article 9, Paragraph 5, to the Amendment in eliminating sexual discrimination. This Article should be examined and amended. This Article shall be void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y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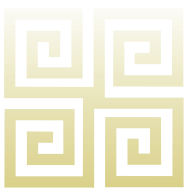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J.Y. Interpretation No. 384 (July 28, 1995)

Issue: The Gangster Prevention Act authorizes the police to arbitrarily classify a person as a gangster, to force him to appear before the police or arrest him, to adopt a secret witness system, and to impose the correc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upon him irrespective of due process of law. Are such provisions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384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Gangster Prevention Act, in authorizing the police to force people to appear before the police without following any necessary judicial procedure, depriving the right of the accused to confront the witnesses, a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a rehabilitative program on a prisoner even after he has served his criminal sentence, and denying a person's right to file an administrative appeal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gainst the police's decision to consider him as a gangster and to issue him admonitions, i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ll of the aforesaid provisions shall become null and void no later than December 31, 1996.



In response to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Articles 5-7, 12 and 21 of the Gangster Prevention Act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the latter's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on August 19, 1996. Later on, the Legislative Yuan deliberated and passed such amendments on December 30 of that same year, which were then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same day as per Directive No. (85)-Hua-Zong-(1)-Yi-8500307310.

The original Article 5 of said Act, which provided that no administrative appeal or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may be filed against the police's decision to consider a person as a gangster and to issue him admonitions, was so amended that a person un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made in response to his objection may now seek reme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rocedures. Articles 6 and 7 thereof originally authorized the police to force people to appear before the police without following any necessary judicial procedure. However, the provisions were so amended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warr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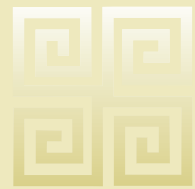
may be made with the court in case of any unjustifiable non-appearance after due notice is given, and that warrantless detention is authorized only under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provided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warrant shall still be forthwith made with the court and the detained person shall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if the court refuses to issue the warrant. Article 12 thereof, which denied the right of the accused to confront the witnesses, was deleted. And, Article 21 thereof, which allowed the imposition of the correc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on a prisoner even after he has served his criminal sentence, was so amended that the term of the correc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may be offset against the terms of imprisonment, detention or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Holding

Article 8, Paragraph 1,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Physical freedom shall be guaranteed to the people. In no case except that of flagrante delicto, which shall be separately prescribed by law, shall any person be arrested or detained other than by a judicial or police org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No person shall be tried or punished other than by a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Any arrest, detention, trial or punishment not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may be resisted. "The phr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in the above Paragraph means that the procedure a governmental organ uses as a basis upon which to impose any measures restraining people's liberty, no matter whether their status is that of a criminal defendant or not, must be prescribed by law. The contents of the law must be proper in substance, and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conditions set up in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s 6 and 7 of the Act for the Prevention of Gangster [hereinafter the "Act"] authorize the police to force people to



appear before the police bureau without following any necessary judicial procedure. The secret witness provision of Article 12 of said Act deprives of the right of the accused to confront the witnesses, and hampers the court's truth-finding function. Article 21 of said Ac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detention, allows the imposition of correc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on a prisoner, even after he has served his criminal sentence, and, therefore, jeopardizes his liberty. All the above articles of said Act exceed the extent of necessity, lack substantive propriety, and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above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Furthermore, Article 5 of said Act, regarding the police's decision to consider a person as a gangster and to issue him admonitions, contradicts Article 16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he could only appeal the decision to the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ut has no right to lodge administrative appeal and institu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ll of the Act's above Articles shall become null and void no later than December 31, 1996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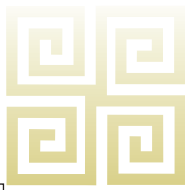
J.Y. Interpretation No. 392 (December 22, 1995)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regard to the prosecutor's power to detain a person and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392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various provisions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regard to the prosecutor's power to detain a person are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so are the provisions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in stipulating "un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as a condition for surrendering the detainee to a court for trial. The said provisions shall cease to be effective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response to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Judicial Yuan jointly proposed a bill on May 10, 1997 to amend Articles 101, 102, 105-III, 121-I and 259-I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whereas the Judicial Yuan also proposed amendments to Article 1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on that same day. Both bills were submit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Legislators also proposed a separate bill to amend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Upon the Legislative Yuan's deliberation and passage of the aforesaid bills,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on December 19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86)-Hua-Zong-(1)-Yi-8600272590 and the amended Habeas Corpus Act on December 15, 1999 as per Directive No. (88)-Hua-Zong-(1)-Yi-8800299070.

Articles 101 and 101-1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s amended, set forth more precise and exact requirements and causes for detention and provided expressly that the power is vested in a judge (Paragraphs I and II). It is added in Article 102 thereof that a writ of detention shall be signed by a judge (Paragraph IV). Article 105 thereof originally empowered the public prosecutor to approve orders given by





head of the detention house. However, the power is transferred to a judge except in case of emergency where 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the detention house may take necessary actions, provided that the same shall be reported immediately to the court concerned for approval (Paragraph III). The various powers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in regard to the detention of the accused (criminal suspect) as set forth in Article 121-I are transferred to a judge. Finally, it is expressly provided in Article 259-I thereof that if an accused who is detained receives a non-prosecution ruling, the deten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withdrawn and the public prosecutor shall then release the accused and notify the court immediately.

As for the Habeas Corpus Act, "un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as a condition for surrendering the detainee to a court for trial as set forth in Article 1 thereof is deleted.



Holding

Criminal procedure, the judicial proceeding to try criminal cases, is one of the powers held by the judicial branch. It is a process with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the penal power of a state. A criminal trial begins with an indictment, which resulted from investigations. When a judgment is final,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ontent of judgment. Therefore, these steps, viz.,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indictment, trial, and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rial and punishment -- they ar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justice. In this process,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to investigate, indict, and punish. Since the duty and function of a prosecutor's office is to carry out its role in criminal justice, its conduct within this sphere of state action shall be deemed "judiciary" in an expansive sense. Therefore, the term "judicial organ" used in Article 8, Paragraph 1, of the Constitution would not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term "judicial





organ" used in Article 77 of the Constitution. Instead, the term is applied as an expansive definition in order that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may be included therein.

The term "trial" defined in Article 8, Paragraphs 1 and 2, of the Constitution means trial by court. He who has no authority to try a case cannot conduct this proceeding. The "court" defined in Article 8, Paragraphs 1 and 2, means a tribunal composed of a judge or a panel of judges empowered to try cases. According to Article 8, 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 if any organ other than a court arrested or detained a person, such organ shall surrender the detainee to a competent court for trial within 24 hours of said action. Therefore,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rticle 101, and Article 102, Paragraph 3, applies mutatis mutandis to Article 71, Paragraph 4, and Article 120, which empowers a prosecutor other than a judge to detain suspects; Article 105, Paragraph 3, of the same Code which empowers a prosecutor to grant a request f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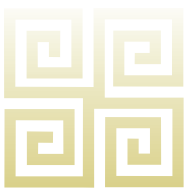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detention submitted by the chief officer of the detention house; Article 121, Paragraph 1, and Article 259, Paragraph 1, of the same Code which empowers a prosecutor to withdraw, suspend, resume, continue detention, or to take any other measures in conjunction with a detention.

These provisions are incongruous with the spirit of the aforementioned Article 8, 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8, 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 merely provides: "When a person is arrested or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 crime, the organ making the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in writing inform said person, and his designated relative or friend, of the grounds for his arrest or detention, and shall, within 24 hours, turn him over to a competent court for trial. Said person, or any other person, may petition the competent court that a writ be served within 24 hours on the organ making the arrest for the surrender





of said person for trial." It does not impose an "un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condition for surrendering the detainee to court for trial. Whereas Article 1 of the Habeas Corpus Act prescribes that "When a person is arrested or detained unlawfully by any organ other than a court, said person, or any other person, may petition the District Court or High Court of the arresting place to issue a writ directing the detainer to surrender the detainee to court for trial." It does add an extra term "unlawful arrest or detention" as a condition for petitioning the writ. Therefore, this provision violates the aforementioned Article 8, 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un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Habeas Corpus Act shall lose effect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of this Interpretation. Yuan-je Tze No. 4034 of this Yuan shall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As to the 24-hour requirement stated in the "turn over within 24 hours" clause of Article 8, 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 it shall



refer to objectively feasible time for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erpretation No. 130 of this Yuan shall still be binding. In the case where good causes exist, any other constitutionally permissible defenses for timeliness shall also be exempted from the 24-hour limit. It is hereby pointed out as well.



J.Y. Interpretation No. 436 (October 3, 1997)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Military Justice Act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436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military trial shall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ue process of law, which includes an independent and just tribunal and procedure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 of the judicial power as st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In light of the spirit of protecting physical freedom and the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a defendant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in a final and conclusive judgment made by the military tribunal in peacetime shall be permitted to appeal directly to an ordinary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received i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Where the Military Justice Act i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shall be invalidated within two years of the announcement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response to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Judicial Yuan jointly proposed a bill on March 29, 1999 to amend the Military Justice Act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Upon the Legislative Yuan's deliberation and passage of the aforesaid bill on October 1 of that same year,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law on the next day, i.e., October 2, as per Directive No. (88)-Hua-Zong-(1)-Yi-8800234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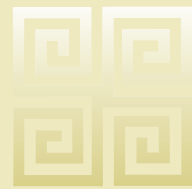
The whole text of the Military Justice Act was amended to reconstruct the military tribunals so as to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 of the judicial power, resulting in 238 articles in eight parts. The major point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Part I) are as follows: The military trial authorities no longer belong to the troops but, instead,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districts;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ND") sets up a three-tier court system, namely, "district," "superior" and "supreme" courts-martial, with their resp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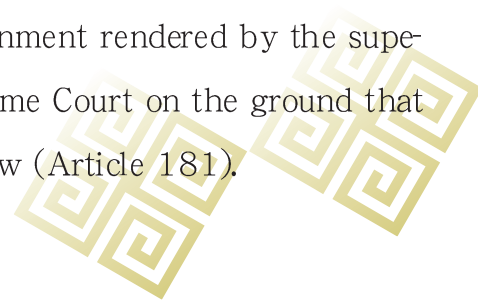
tive organizations and jurisdictions expressly defined; the MND's supervision over said courts' administrative matters shall not affect the exercise of their jurisdictions; the scope of active-duty soldiers is tightened; the term "active-duty soldiers" is redefined; the status of military tribunal officers is strengthened (the aforesaid provisions being provided in Chapters I through III); separation of trial and prosecution is strictly enforced, providing expressly that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offices at the various courts-martial shall exercise their authorities independently (Chapter IV); the military prosecutor's power to detain is cancelled and transferred to the courts-martial, and provision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re added in reference to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Chapters V through X); a new chapter is dedicated to evidence to bring the principle of evidence-based trials into play (Chapter XI). Moreover, the original Article 11 thereof, which provided that the MND was the supreme military trial tribunal, Articles 13 and 34, which dealt with military officers' participation in trials, Article 133, which provided for a superior officer's power to





approve and appeal a judgment, and Article 158, which provid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a tribunal must be approved by a superior officer, are outright removed so as to ensur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those provisions in regard to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trial, appeal, interlocutory appeal, retrial, extraordinary appeal and enforcement procedure (Parts II through VII) are subjected to a major overhaul based on the holding of said Interpret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pretation's holding that a defendant shall be permitted to appeal directly to an ordinary court for relief, it is added that a person unsatisfied with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rendered by the supreme military tribunal or a sentence of death or life imprisonment rendered by the superior military tribunal may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received i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Article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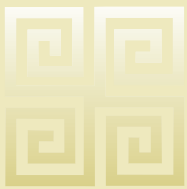




Holding

It states in Article 8, Paragraph 1,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physical freedom shall be guaranteed to the people an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tried or punished otherwise than by a court of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It also provides in Article 16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the people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Active-duty soldiers are also "the people" and thus deser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tection. In addition, it stipulates in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except for those who are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no person shall be subject to trial by a military tribunal." Given that active-duty soldiers have the special obligation of protecting the country, a military tribunal is established for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said soldiers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need. It shall not be interpreted such that military tribunals have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upon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active-duty soldiers. There is no stipulation in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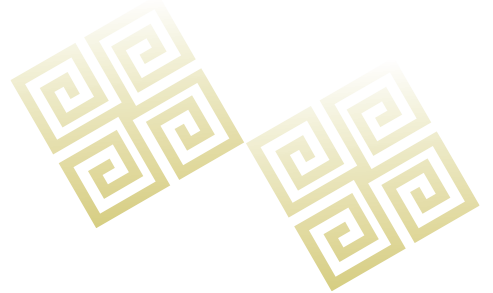


Constitution concerning military trial; nevertheless, such system may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law. The initi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ilitary trial, which is within the power of punishment of the nation, shall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the due process of law, which requirement includes an independent and just tribunal and procedure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s stated in Articles 77 and 80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aws governing the procedure of a military trial which limit the rights of active-duty soldiers sha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 as stated in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In light of the spirit of protecting physical freedom and the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and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77, the defendant receiving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in a final and conclusive judgment made by the military tribunal in peacetime shall be permitted to appeal directly to a normal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received i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Articles 11, 133, Paragraphs 1 and 3, and 158 of the Military Justice Act and the rest of the Act which state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permitted to appeal to the normal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received from the military tribunal i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are unconstitutional and shall be invalidated two year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t the latest. The relevant authority shall, within the two-year period, revise relevant laws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adjust the relevant appeal system, improve the separ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rial in the military tri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criteria to appoint army officers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tribunals and the status protection of military judges to meet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trial.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unconstitutional?

A Summary of No. 445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which provides for numerous essential conditions for whic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deny the application for assembly,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thus shall becom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response to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a bill to amend Articles 6, 9 and 11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on October 17, 2000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Upon the Legislative Yuan's deliberation and passage of the aforesaid bill on June 4, 2002,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law on June 26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91)-Hua-





Zong-(1)-Yi-09100128080.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as amended, modified the proviso of Article 9-I by removing the six-day prior application restriction for an application for an assembly or parade because of any unforeseeable major accident, hence protecting the people's freedom of an incidental assembly or parade. Article 11 thereof was also amended to make the previously generalized provisions clear and specific in respect of the situations where an outdoor assembly or parade will not be approved. The provision of said article, which would deny the application for an assembly that "advocates communism or secession of territory," was deleted so as to protect the participants' freedom of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views.





Holding

Article 14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the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Like Article 11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provides for the freedom of speech, teaching,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it is also a kind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in practicing democracy.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people's freedom of assembly, the nation shall provide appropriate places for, 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regular process of, assemblies and parades. In restricting the rights of assembly and parade by law, the principle of clarity and definiteness of law and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complied with.

Article 8-I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provides that, unless any of the situation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proviso of the same paragraph exists, anyone who wants to hold an outdoor assembly or a parade shall





apply for permission from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rticle 11 of said Act provides that, unless any of the situations listed in the same article exists, the application for an outdoor assembly or a parade shall be approved. To the extent that those items in regard to time, place, and manner are irrelevant to the purposes or contents of the assembly or parade, and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advancement of public welfare, they should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and will not result in any infringement of the purpos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refore,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 of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is not violated.

Article 11 (i)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which provides that any violation of Article 4 of the said Ac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for whic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deny the application for an outdoor assembly, prohibits? any speech that "advocates communism or secession of territory." The said provision, which allow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o censor the contents of a political speech prior to the approval



of an assembly or a parad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Subparagraph 2 of said article, providing that "There are facts showing the likelihood that national security, social order or public welfare will be jeopardized," and Subparagraph 3 thereof, providing that "There is the likelihood that public safety or freedom will be jeopardized, or there will be serious damage to property," are neither specific nor clear enough. The mere basis on whic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either approve or deny an application for an assembly or a parade is the future possibility of occurrence instead of a factual showing of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s such, the said provisio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thus shall becom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rticle 6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which stipulates a restri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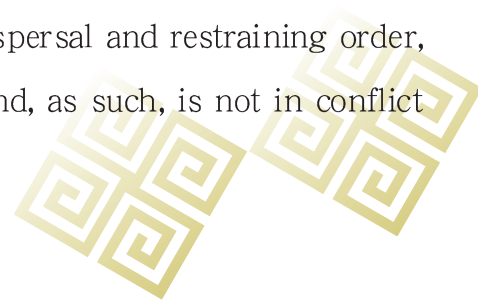
area for assembly and parade, is intended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government leaders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and to maintain the unobstructed flow of traffic and communications. Article 10 of said Act stipulates the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assembly or parade, his or her agent or picket. Article 11(iv) thereof provides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an assembly or a parade shall be denied if the same time, place, and route have been applied for by another and been approved. Article 11(v) thereof provides that the application for an assembly or a parade by a group may be denied if such group is not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r permission for its establishment has been withdrawn, or it has been ordered to dissolve. Article 11(vi) thereof provides that the application may not be approved if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conform to Article 9,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requires the applicant to submit a completely filled-out application form. All of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are meant to ensure a peaceful assembly or parade and to prevent any disturbance of the public quiet, which are necessary to either prevent infringement upon the freedom of





other people,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or to advance public welfare, and thus are not in conflict with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Nonetheless, the proviso of Article 9-I of the said Act reads, "An application may be submitted two days (prior to an assembly or parade) where there is any justifiable reason because of any natural disaster or any other unforeseeable major accident." Denying an application for an incidental assembly or parade that is not filed two days prior to such assembly or parade i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people's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thus requires prompt and speedy review and revision.

Article 29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which imposes criminal liability on a chief violator who disobeys a dispersal and restraining order, is within the scop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and, as such, is not in conflict with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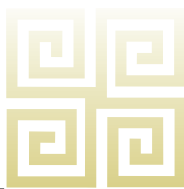
J.Y. Interpretation No. 452 (April 10, 1998)

Issue: Is the pro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that allows one spouse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couple's domicile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452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pro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that allows one spouse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couple's domicile does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 other party to the marriage also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domicile and does not cov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hich i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hence shall become void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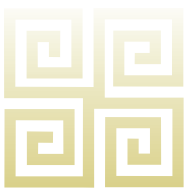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A number of Legislators first proposed a bill to amend Article 1002, inter alia, of the Civil Code, Part IV Family, on December 20, 1997. Upon the announcement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it after deliberation on May 28, 1998 and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law on June 17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87)-Hua-Zong-(1)-Yi-8700121300.

Article 1002 of the Civil Code, as amended, modified the original provision that a spouse may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couple's domicile and provides that such domicil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that, in case of any lack of such an agreement or any failure to reach such an agreement, an petition may be made with the court to determine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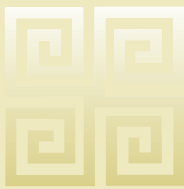




Holding

It stipulates in Article 1002 of the Civil Code that the residence of the wife shall be that of the husband and the residence of the taken-in husband shall be that of the wife; nevertheless, in case there is an agreement that the residence of the husband shall be that of the wife or the residence of the wife shall be that of the taken-in husband, the agreement shall be upheld. Though the proviso render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husband or the wife to make an agreement on the residence, one shall accept the residence of another as his/her residence in the case where the husband or the wife of the taken-in husband refuses to make such an agreement or in the case where no agreement can be made. The above law does no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 other party of the marriage also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residence and does not cov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which is in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proportionality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above law shall become void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addition, the designation of the





residence of the coup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rital obligation to cohabitation. The residence stipulation is mad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legal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ouple, which shall not be viewed as the only place designated by the Civil Code where the couple may perform their marital obligation to cohabitation. Both parties to the marriage have the obligation to live together as long as the marriage shall last,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a residence may have been designated.



J.Y. Interpretation No. 457 (June 12, 1998)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 for the Handling of the Government Owned Housing and Farmlands Vacated by Married Veterans after Their Hospitalization, Retirement or Death, which deprive a married daughter of a veteran of her heirship in respect of the distributed farmland and its subsequent cultivation upon the veteran's death,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457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state-owned farmland distributed to a veteran may be inherited by his son only, regardless of the son's marital status, but shall be reclaimed unconditionally upon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Said provisio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henc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review and revis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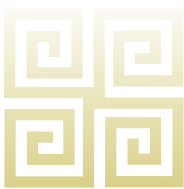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Based on the intent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issued the Regulation for the Handling of the Applications Made by Surviving Dependents of Married Veterans for



Continual Cultivation on Plantations Owned by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after the Veterans' Death on December 16, 1998 and repealed the Regulation for Handling of the Houses and Lands Vacated by Married Veterans Working on Plantations Owned by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after their Hospitalization, Retirement or Death.

Based on the intent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newly issued Regulation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ose surviving dependents who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continual cultivation and indirect care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deceased veteran's spouse, major children and adopted children who meet specific requirements (Section 3 thereof). The provision of the erstwhile Regulation that the farmland would be reclaimed unconditionally upon the marriage of the daughter is deleted.





Holding

"All 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rrespective of sex, shall be equal before the law; the state shall further substantive gender equality."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are unambiguously set forth in Article 7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rticle 10-VI of the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respectively. The state organ, in implemen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missions, shall also comply with the aforesaid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while engaging in private acts that are subject to private law.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Handling of the Government Owned Housing and Farmlands Vacated by Married Veterans after Their Hospitalization, Retirement or Death as proclaimed by the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the Executive Yuan, are undoubtedly designed to ensure the livelihood of veterans and their surviving dependents, whereby parcels of state farmland are distributed to veterans as special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y the state. As such, the rights and legal benefits so conferred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acquired by ordinary citizens. A legal relationship of loan for use is formed between a veteran and the state as far as the distributed farmland is concerned. Upon the death of the veteran 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oan for us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terminate the contract to reclaim the farmland so as to use the national resources in a reasonable manner. If, instea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llows the veteran's surviving dependents to continue using and cultivating the originally distributed housing and farmland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ensuring their livelihood, it should then consider whether the scope of the term "dependents" should extend to the veteran's children, and should consider their abilities to earn a living and cultivate the farml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 assistance before making appropriate pla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Section 4-III of the aforesaid Regulations for Handling of the Housing and Lands provides, "If the surviving spouse of





the deceased veteran remarries but without issue or only has daughter(s), the land and housing shall be reclaimed unconditionally upon the marriage of the daughter(s); and the rights of the veteran may be inherited by his son, if an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stat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in respect of a deceased veteran is limited to his son regardless of the son's marital statu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aforesaid principle.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carefully review and revis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based on the aforesaid essenc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J.Y. Interpretation No. 471 (December 18,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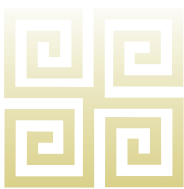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Issue: Does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ntrol and Prohibition of Gun, Cannon, Ammunition, and Knife, in imposing mandatory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upon the convicted,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471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provision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ntrol and Prohibition of Gun, Cannon, Ammunition, and Knife imposes a mandatory measure of three-year compulsory labor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the person's propensity to endanger the society. Thus, it may restrain the movement and liberty of those without such propensity, rendering it in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s such, such provisions shall b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response to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ssued a directive to its subordinate prosecutors' offices on January 26, 1999, to review the cases concluded prior to the date of said Interpretation where a mandatory three-year compulsory labor is conclusively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I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ntrol and





Prohibition of Gun, Cannon, Ammunition, and Knife and see if any and all of them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 case of any inconsistency with said principle, a petition shall be made with the court to cancel or terminate the enforcement thereof, as the case may be.

Moreover, th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a bill to amend Article 19, inter alia,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ntrol and Prohibition of Gun, Cannon, Ammunition, and Knife,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the latter's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on November 14, 2000.

Upon the Legislative Yuan's deliberation and passage of the aforesaid bills on October 31, 2001,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law on November 14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90)-Hua-Zong-(1)-Yi-9000223470.

Deleted is the original provision of Article 19 of said Act that imposed a mandatory rehabilitative measure.



Holding

Article 8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physical freedom shall be guaranteed to the people. Contents of statutes restraining physical freedom must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are supplemental to the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aim at rehabilit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person with criminal propensity by restraining his movement and liber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established in the rule of law which protect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Code,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under the statutes must be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he measures imposed must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act, the person's criminal propensity, and the future expectation of such person. Article 19, Paragraph 1,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Control and Prohibition of Gun, Cannon, Ammunition, and Knife [hereinafter "the Act"] provides: "If convicted under Articles 7, 8, 10, 11, Paragraphs 1 to 3 of





Article 12, and Paragraphs 1 to 3 of Article 13 and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a prisoner shall be sent to a place of labor, and be compelled to labor for three years after he has served his sentence or has been pardoned." The provision imposes a mandatory measure of three-year compulsory labor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the person's propensity to endanger the society. Thus, it may restrain the movement and liberty of those without such propensity, making it disproportionate to its purpose under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mandatory measure of three-year compulsory labor for those convicted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Ac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the person's propensity to endanger the societ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shall b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measures of the Act may still be imposed on those convicted under Article 19, Paragraph 1, of the Act as long as they are proportion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f the measures of the Act are disproportionate, a trial judge may, at his discretion, apply Article





90, Paragraph 1, of the Criminal Code and impose other measures if he believes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In the latter case, Article 2, Paragraph 2, of the Criminal Code shall not apply.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the newer or the more lenient law shall still govern.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Police Duty Act in respect of the execution of checkpoint searche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 Summary of No. 535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ways in which police checks are conducted may have a great effect upon personal freedom, property right and right of privacy and therefore such checks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s guiding police functions and legal enforcement in a rule-of-law nation. The existing laws concerning the police law enforcement are not sufficient;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ould conduct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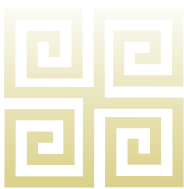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mmediately sent it via facsimile to the various police authorities and demanded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



forms, show their identifications and make known the reasons while implementing checkpoint searches, roadside checks or interrogations, etc. The said Agency also demanded precision in formulating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for conducting checkpoint searches while attending to the techniques and attitudes in law enforcement, with an aim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Furthermore, it also prescribed the Regulation Governing the Police Enforcement of Checkpoint Searches and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the Police Enforcement of Checkpoint Searches to provide for a more precise procedural basis. In addition, it held numerous seminars and symposia on the related topics.

Furthermore, in respect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certain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proposed a bill to enact the Police Functioning Act on May 29, 2002 whereas the





Executive Yuan also submitted a draft of the Act Gov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e Duties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the latter's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on December 13 of that same year. Later on, the Legislative Yuan reviewed both bills simultaneously and passed the law titled the Police Functioning Act on June 5, 2003, which was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on June 25 as per Directive No. (92)-Hua-Zong-(1)-Yi-09200116580.

The newly enacted Police Functioning Act consists of thirty-two articles in five chapters, which clearly provides for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for conducting checkpoint searches, as well as the remedies for illegal checkpoint searches. The law, at its very beginning, makes clear that it is intended to have the police exercise their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law and to require that the police should, in exercising their authorities,



not go beyond the degree of necessity but use the least intrusive means, wear uniforms or show their identification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make known the reasons, etc. (Chapter I). Then, the law clearly specifies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a person's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antaneous compulsory measures in the event of emergency and dangerous situations (Chapters II and III). Finally, it expressly provides for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a person who believes that the police, while exercising their authorities, have infringed upon his or her interests (Chapter IV).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marks the new era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police functions.





Holding

The Police Service Act, whose provisions involve police services,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division of labor as well as detailed methods by which police services are to be implemented, is not merely an organic act, but also legislation of a regulatory nature.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Clause 3, of said Act, a police check is authorized as a way for police to facilitate law enforcement. However, the ways in which police checks are conducted including searches, street checks, and interrogations may have a great effect upon personal freedom, right to travel, property right and right of privacy and therefore such checks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as well as legal principles guiding police functions and legal enforcement. Thus, to fully ensure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eople'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of police checks as well as legal remedies for unlawful checks must be prescribed clearly in the law.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concerning police checks in the aforementioned Act never delegate police unlimited authority to exercise any check, law enforcement or interrogation without due consideration of time, place, manner and subjects. Unless prescribed otherwise in the law, the police shall limit checking authority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public places, or other places where danger exists or may exist according to reasonable and objective judgment. Among these places, some places may be private residences that must be protected to the same extent as any home. Police shall not exercise checking authority over any persons unless there is a reasonable belief that actions taken by such persons have caused or may cause danger; and in so doing, police must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not go beyond the degree of necessity. Before conducting any checks, police must inform the involved persons immediately of the reasons for exercising such checks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clearly





a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ny police check must be conducted on the spot. If police do not obtain the consent of persons to be checked and, with no alternative to identify persons to be checked or conduct on-the-spot checks, they still conduct such checks, this may have harmful effects or may impede traffic flow and interfere with social tranquility. Moreover, police are not permitted to ask checked persons to go to a police station for further interrogation. Aft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ch persons has been confirmed, police should permit them to leave without delay unless they are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 crime, in which case criminal law procedures should be followed. Insofar as construed and applied, Article 11, Clause 3, of the aforementioned Act is read as constitutional and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Nonetheless, the current laws concerning police law enforcement are not sufficient;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review relevant provision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enact new laws within two years after the





releas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which would allow police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occurrences in law enforcement while sufficiently ensuring people's freedom and their own saf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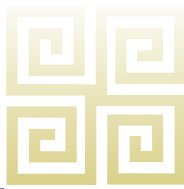


J.Y. Interpretation No. 556 (January 24, 2003)

Issue: Shall a member of a criminal syndicate be deemed to b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yndicate under the 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as ruled in Interpretations Nos. 68 and 129, if he voluntarily surrenders himself to the authorities before his act of participation is discovered or has had no contact with the syndicate or has not participated in syndicate activities for a long time,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e has positively broken away from the criminal syndicate, or shall the said Interpretations be overruled?

A Summary of No. 556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The burden of proof falls on the prosecutor when it comes to whether the participation in a criminal syndicate is in a continuous state. Where a syndicate member voluntarily surrenders himself to the authorities before his act of participation is discovered or has neither had any contact with the syndicate nor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syndicate activities for a long time,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e has positively broken away from the criminal syndicate, he should no longer be consid-



ered to b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yndicate. The interpretations concerned should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J.Y. Interpretation Nos. 68 and 129, as well as Interpretation Yuan-Tze No. 667, should be modifi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concern whether the act of participation in a criminal syndicate is continuous and the share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relevant cases and decisions shall no longer be cited and appli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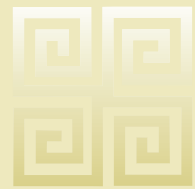




Ho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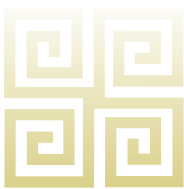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The existence of criminal syndicates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of harm to the legal interest protected by law, and must, of course, be prevented and eliminated. The purposes of the 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are to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and safeguard the legal interest of individuals by means of preventing and restraining criminal activities of an organized pattern. The term "participation in a criminal syndicate" used in Article 3, Paragraphs 1 and 2, of the Act denotes that to constitute the offense it is sufficient that one joins a criminal syndicate and becomes a member thereof,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he participates in any activity of the syndicate. Whether such an act is in a continuous state is determined by the fact of whether h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s in activities of the syndicate or maintains contact with the syndicate. The burden of proof of this criminal act lies legally with the prosecutor that represents the state in the prosecution of crimes. Where a syndicate member voluntarily surren-





ders himself to the authorities before his act of participation is discovered or has had no contact with the syndicate or has not participated in syndicate activities for a long time,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e has positively broken away from the criminal syndicate, he should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to b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yndicate.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is Yuan's Interpretation No. 68, which is intended to explicate the Betrayers Punishment Act, quotes: "A person who participated in a rebel organization shall certainly be deemed to b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ing in the organization before he voluntarily surrenders himself to the authorities or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that he has definitely broken away from the organization." Now that this Act has been repealed, the above-cited Interpretation together with other similar interpretations delivered by this Yuan, namely Interpretation Yuan-Tze No. 667 and Interpretation No. 129, must be overruled to the extent that any





part thereof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our holding here in respect of whether the act of participation in a criminal syndicate is continuous and the share of the burden of proof. Furthermore,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8, Paragraph 1, of the 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im period does not pre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line with the foregoing purpose, and is not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hysical freedom of the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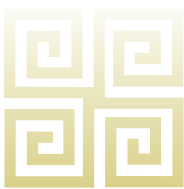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J.Y. Interpretation No. 587 (December 30, 2004)

Issue: Article 1063 of the Civil Code and relevant precedents limit a child's right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against the legitimate father as well as a natural father's right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against the child who has been presumed to be another's legitimate child. Are such limits unconstitutional?

A Summary of No. 587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A child's right to identify his or her blood filiations and to ascertain his/her patern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and shall be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Civil Code, in failing to provide that a child is entitled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against his or her natural father and to provide for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the accrual of such a cause of action for his or her peti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and the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Accordingly,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all endeavor to review and amend the relevant la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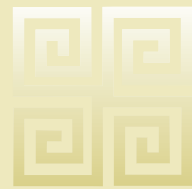




Upon the issuance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Judicial Yuan jointly proposed a bill on April 20, 2006 to amend Article 1063, inter alia, of the Civil Code, Part IV Family,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A number of Legislators also proposed relevant amendments on April 19 of that same year. Upon the Legislative Yuan's simultaneous deliberation and passage thereof on May 4, 2007, the President promulgated the amended law on May 23 of that same year as per Directive No. (96)-Hua-Zong-(1)-Yi-09600064111.

Article 1063 of the Civil Code, as amended, entitles a child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against his or her legitimate father (Paragraph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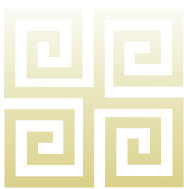




Holding

A child's right to identify his/her blood filiations and to ascertain his/her patern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and shall be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1063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Where the conception of the wife is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 marital relationship, the child so born is presumed to be legitimate. In regard to the presumption of legitimacy provid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ither the husband or the wife may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if he or she can prove that the conception of the wife is not from the husband; but such disavowal shall be effected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ld's birth." Such law is intended to balance the maintenance of a stable status ord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a child's interests. However, such right may only be exercised by either of the spouses, while the child is not entitled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Nor does the provision con-





sider the reasonableness of extinctive prescription for a child's petition. Therefore, the law has inappropriately restricted the right of a child to litigation, and is thus insufficient in defending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Within this ambit, such law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and the right to litigation. The relevant holdings of the Supreme Court Precedents Year 23-No.3473 (1934) and Year 75-No.2071 (1986) should no longer be applied. In response, the concerned legislative authorities shall endeavor to amend relevant laws regarding the legal subject and the extinctive prescription of disavowal of paternity in line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J.Y. Interpretations Nos.177 and 178, if a statute or a precedent invoked by a finalized judgment is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by this Yuan as a result of the people's application for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disadvantaged party of the judgment may, basing the petition on



tha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pply for relief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litigation procedure. If the party of this case is not entitled to a retrial, he/she shall be allowed, within a year after this Interpretation is announced, to br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against the legally presumed father. In such cas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disavowal of paternity in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When the action is initiated by a statutory agent, it should be brought for the child's best interests.

The law which disqualifies a natural father from bringing an action for disavowal re his child presumed to be born in wedlock is intended to prevent damage to marriage stability, family harmony and the right of a child to education and nurture, and is thus not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As to whether the law is to be amended to loosen the restrictions for such ac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J.Y. Interpretation No. 603 (September 28, 2005)

Issue: Ar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 8-II and III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stat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new ROC identity card will not be issued without the applicant being fingerprinted, unconstitutional?

A Summary of No. 603 and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 Regulations

Fingerprints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a person, who shall have self-control of such fingerprint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protected under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in refusing to issue an ROC identity card to one who fails to be fingerprinted thereunder, is no different from conditioning the issuance of an identity card upon compulsory fingerprint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 keeping. As such,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 and thus shall no longer apply as of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n regard to Article 8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th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a bill on April 23, 2005 to strike out Paragraphs 2 and 3 thereof and submitted sam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Nevertheless, the Legislative Yuan did not



pass it.

Upon issuance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delet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 22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in respect of fingerprinting based on the holding of said Interpretati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that the overall replacement of identity cards must be conditioned on fingerprinting were also struck out. Beginning on December 21, 2005, the overall replacement of identity cards was launched—without fingerprinting any person.

As for Article 8-II and - III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the draft amendment thereto (deletion of Paragraphs 2 and 3)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nt of said Interpretation. Since the issuanc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s actively endeavored to coordinate with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deliberating and amending the law so as to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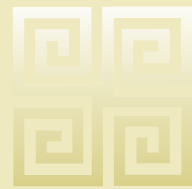




Holding

To preserve human dignity and to respect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is the core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free democracy. Although the right of privacy is not among those rights specifically enumer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it should nonetheless be considered as an indispensable fundamental right and thus protected under Article 22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purposes of preserving human dignity, individuality and moral integrity, as well as preventing invasions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maintaining self-control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ee J. Y. Interpretation No. 585) As far as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is concerned, which regards the self-control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t is intended to guarantee that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disclos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f so, to what extent, at what time, in what manner and to what people such information will be disclosed. It is also designed to guarantee that th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now and control how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correct any inaccurate entries contained in their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make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absolute,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te may impose appropriate restrictions on such right by enacting unambiguous laws as far as such laws do not transgress the scope contemplated by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Fingerprints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a person, who shall have self-control of such fingerprint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protected under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However, the issuance of ROC identity card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eople's exercise of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Article 8-II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provides, "While applying for an ROC identity card pursuant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applicant shall be fingerprinted for record keeping; provided that no national





who is under fourteen years of age will be fingerprinted until he or she reaches fourteen years of age, at which time he or she shall then be fingerprinted for record keeping." Article 8-III thereof provides, "No ROC identity card will be issued unless the applicant is fingerprinted pursuant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Refusal to issue an ROC identity card to one who fails to be fingerprinted according to the aforesaid provisions is no different from conditioning the issuance of an identity card upon compulsory fingerprint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 keeping. The failur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to specify the purpose thereof is already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 to protect the people's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Even if it may achieve such objectives as anti-counterfeit or prevention of false claim or use of an identity card, or identification of a roadside unconscious patient, stray imbecile or unidentified corpse, it fails to achieve balance of losses and gains and uses excessively unnecessary means,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 8-II and III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providing to the effect that no ROC identity card will be issued unless an applicant is fingerprinted for record keeping,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intent of Articles 22 and 23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us shall no longer apply as of the dat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Needless to say, the replacement of ROC identity cards, which follows the remaining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may still carry on.

Whe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engage in mass collection and storage of the people's fingerprints and set up databases to keep same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particular major public interest, it shall not only prescribe by law the purposes of such collection, which shall be necessary and relevant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urposes of such major public interest, but also prohibit by law any use other than the statutory purposes. 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engage in the aforesaid collec-





tion in a manner that is sufficient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safet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ake any and all necessary protective measures both organizationally and procedurally as to the files of fingerprints so collected so as to be in line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intent to protect the people's righ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12 件

◆◆◆
人權の保障、両性の平等に関する大法官の重要な解釈

Constitutional Court Republic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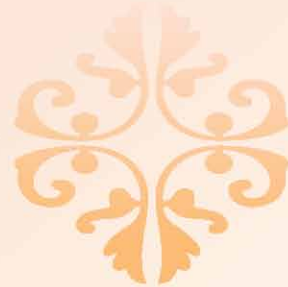
はしがき

中華民国(台湾)は人権立国の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である。憲法の解釈を職権とされる司法院大法官(諸外国の憲法裁判所の裁判官に相当する)は、憲政秩序の維持及び人権の保障の番人としての理念に基づき、すでに数多くの重要な解釈を作成し、それらが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としてのイメージの向上にあたって、積極的な意義を有する一方、国際社会においてもまた、指標的地位を築き上げている。

国際社会に我が国が人権の保障及び両性の地位的平等への保護にかかる努力と実績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ために、司法院は数多くの大法官解釈の中から、とりわけ十二件の代表的解釈を選ぶとともに、そうした解釈の公布後に関係法令の改正に影響を与えた状況を人権の保障及び両性の平等に関心のある諸外国の皆様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同時に中国語、英語ならびに日本語の三ヶ国語で編集した。

司 岳 生

2007年9月司法院にて





目次

はしがき.....	116
1. 司法院积字第365号解释(1994.9.23).....	118
2. 司法院积字第384号解释(1995.7.28).....	120
3. 司法院积字第392号解释(1995.12.22).....	124
4. 司法院积字第436号解释(1997.10.3).....	130
5. 司法院积字第445号解释(1998.1.23).....	135
6. 司法院积字第452号解释(1998.4.10).....	140
7. 司法院积字第457号解释(1998.6.12).....	142
8. 司法院积字第471号解释(1998.12.18).....	146
9. 司法院积字第535号解释(2001.12.14).....	150
10. 司法院积字第556号解释(2003.1.24).....	156
11. 司法院积字第587号解释(2004.12.30).....	159
12. 司法院积字第603号解释(2005.9.28).....	163



本件の争点：民法が親権の行使に関して父権を優先とする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民法が両親の未成年の子に対する権利の行使にあたってその意思に不一致のある時は、父がこれを行使すると規定しているが、これは憲法及び憲法増修条文の性差別の撤廃という趣旨に合致しておらず、修正されるべきであり、そのうえで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遅くとも2年を満した時に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立法院の一部立法委員が本号解釈に応じて、1996年5月31日に民法親族編第1089条等の一部改正案を提出し、審議に付した。立法院は1996年9月6日に可決し、総統は同年9月25日に「(85)華総(一)義字第8500231840号令」を以って同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改正・公布された民法第1089条は、両親の未成年の子に対する権利の行使にあたってその意思に不一致のある時は、父がこれを行使するとしていた規定を、両親の未成年の子に対する重大事項にかかる権利行使の意思に不一致のある時は、子の最高利益に基づきこれを決定することを裁判所に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改正した(第2項)。



解釈文

民法第1089条は、両親の未成年の子に対する権利の行使に関する意思が不一致の時は、父により行使されると規定している部分は、憲法第7条にいう人民は男女が分別されることなく法律上は一律に平等である、および憲法増修条文第9条第5号の性差別の撤廃という趣旨に合致しておらず、修正を検討すべきであり、そのうえで本解釈公布の日から、遅くとも2年を満時とし、その効力を失うものとする。



本件の争点：暴力団肅清条例にかかる緊急逮捕、秘密証人等の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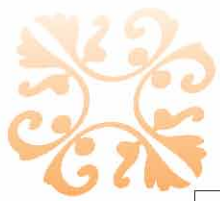
解釈は、暴力団肅清条例は、警察機関に緊急逮捕し得ることを授権すること、決定により移送された者と証人との交互尋問の権利を剥奪すること、刑の宣告また執行された者に再び感訓処分を受ける虞があるとさせること、警察機関が暴力団と認定したうえで与える誠告の処分につき人民は訴願及び行政訴訟を提起し得ない等の規定、これらはすべて憲法の趣旨に相違しており、遅くとも1996年12月31日までに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行政院は本号解釈に応じるため、1996年8月19日に暴力団肅清条例の第5条から第7条、第12条、第21条等の一部改正案を立法院に提出し、審議を付した。立法院は同年12月30日に法案を可決し、総統は同日に「(85)華総(一)義字第8500307310号令」を以って同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改正・公布された当該条例において、第5条は本来警察機関が暴力団と認定したうえで与える誠告の処分につき人民は訴願及び行政訴訟を提起し得ないと規定していたが、異議申し立ての決定を不服とする際に、訴願及び行政訴訟の手続により救済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改正された。第6条、第7条は本来警察機関に緊急逮捕し得ることを授権するとしていたが、合法の通知がありながら正当な理由が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指定の場所への召喚に応じなかった者については、裁判所に逮捕許可状の発行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お特殊な場合においてのみ直ちに逮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即時に裁判所に逮捕許可状の発行を請求すべきであり、もしも裁判所がこれを許可しない場合は、直ちにその者を釈放すべきであると改正された。決定に移送された人と証人との交互尋問の権利を剥奪するという第12条の原規定は削除された。刑の宣告また執行をされた者に再び感訓処分を受ける虞があるとさせる第21条の原規定は、感訓処分の期間は懲役、禁錮または保安処分の期間と互いに換算すると改正された。





解釈文

憲法第8条第1項は、「人民の身体の自由は保障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法律により別に定める現行犯の逮捕の場合を除いては、司法又は警察機関による法定手続きによらなければ、人民を逮捕又は拘禁してはいけない。法院による法定手続きによるのでなければ、人民を審問又は処罰してはいけない。法定手続きによらない逮捕・拘禁・審問又は処罰はこれを拒絶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規定している。「法定手続き」ということは、凡そ人民の人身自由に関する制限の処分について、その対象が刑事被告人であるかどうかを問わず、国家機関の行う手続きは法律をもって規範が設けられ、さらにその内容が必ず実質として適正であり、また憲法第23条の条件の要件に符合し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指すのである。やくざ者取締法(検肅流氓條例)第6条及び第7条は、警察機関に強制的に人民を出頭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権限を与え、何らの必要としての司法手続きをも行わないとし、同法第12条は秘密証人の制度という制度ことにより、裁定に送致された者の証人尋問の権利が剥奪され、法院の真実発見も妨げることになり、同法第21条において実刑判決





を受けた者及び受刑者に、特別予防の要求があるか否かを問わず、保安処分により恣意的に人身自由を喪失させる虞れを避けかねない、これらの条文は全て必要な程度を逸し、実質上適切さに欠け、前述した憲法の趣旨に反している。また、同法第5条における警察機関がやくざ者と認定し、勧告の処分を与えたことに対し内政部警政署に異議申立てのほか訴願か行政訴訟を提起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することも、憲法第16条の趣旨に反している。以上の各々の規定はこの解釈文が公布してから1996年12月31日までにその効力を失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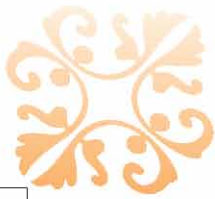
本件の争点：刑訴法の検察官の勾留権、提審法の提審要件等の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刑事訴訟法の被告勾留に関する各項の処分権を検察官に付与する規定、また提審法の「違法な逮捕禁錮」を提審の申請条件とすることは、ともに憲法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あり、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遅くとも2年を満した時に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行政院と司法院は本号解釈に応じるため、1997年5月10日に刑事訴訟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05条第3項、第121条第1項、第259条第1項等の一部改正共同草案を提出し、司法院もまた同日に提審法第1条等の一部改正案を提出し、ともに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その他、一部の立法委員もまた刑事訴訟法の改正案を提示し審議を付した。改正案は立法院による前後の審議・可決した後、総統が同年12月19日に「(86)華総(一)義字第8600272590号令」を以って刑事訴訟法を公布し、1999年12月15日に「(88)華総(一)義字第8600272590号令」を以って提審法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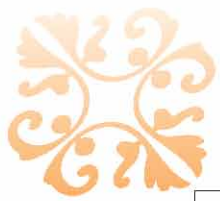
改正・公布された刑事訴訟法第101条、第101条の1は、勾留の要件及



びその理由について更に明確且つ厳格な規定を設け、そのうえ裁判官によりこれを行うことを明確に定めた(第1、2項)。第102条は勾留状は裁判官により署名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規定を増設した(第4項)。第105条は本来勾留場所の長の命令を許可する権限を検察官に付与するとしていたが、裁判所によりこれを行うと改め、緊急の場合には、検察官或いは勾留場所の長により先に必要な処分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が、但し、即時に裁判所に報告し許可を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3項)。第121条第1項は、本来被告(被疑者)の勾留に関する各項の処分を検察官に付与するとしていたが、すべて裁判所によりこれを行うと改めた。並びに第259条第1項において、勾留された被告が不起訴の処分を受けた際は、勾留は取消されたものと見なし、検察官は直ちにその者を釈放すべきであり、並びに即時裁判所に通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明確に定められた。

提審法の部分については、その第1条の「違法な逮捕禁錮」を提審の申請条件とした規定は削除された。





解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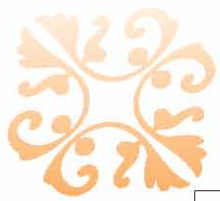
司法権のひとつとしての刑事訴訟、ちなみに国家刑罰権を実現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の刑事裁判に関する司法手続きについては、その裁判ということは、訴追をはじめに、だが訴追のため必ず捜査を実施し、なお判決が確定することにより、刑の執行を経た後、裁判の内容が実現され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これらの手続きは完全に裁判・処罰を除い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言い換えれば、捜査・訴追・審判・刑の執行の各々は刑事手続きの一部であり、国家の代表として「捜査」「訴追」「執行」を行う検察機関は、職権を行使し、刑事司法の任務を達成するのを目的とする以上、このような意義としての国家作用に関しては広義な司法機関のひとつである。その故に、憲法第8条第1項の文言の「司法機関」は、同法第77条の規定における司法機関だけを示すものではなく、検察機関も含まれた広義な司法機関である。





憲法第8条第1項、第2項の規定における「審問」は、裁判所が審理する中の訊問であり、裁判権を有しない者は行ってはならない。よって、この2項の条文にいう「法院」は裁判権を有する裁判官が構成された一人制或いは合議制の法院をいう。法院ではない機関が逮捕・拘禁を行うと、前述の憲法第8条第2項の規定に従い、遅くとも24時間以内に犯罪嫌疑のため逮捕拘禁された人が管轄法院に移送し審問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故に、現行の刑事訴訟法第101条・第102条第3項を準用する第71条第4項及び第120条などの規定が法院を他にして、なお検察官に被告人を拘留する権限を与え、同法第105条第3項が検察官に拘留所長官の命令を許可する権限を付与し、同法第121条第1項・第259条第1項が検察官に拘留の取消、拘留執行の停止、拘留執行の停止の取消・拘留の延長及びその他被告人拘留の関する処分を与えることは、前述の憲法第8条第2項の規定の趣旨に違反する。





憲法第8条第2項は、「人民が犯罪の嫌疑のため逮捕・拘禁されたときは、その逮捕・拘禁の機関は逮捕・拘禁の理由を書面にして本人及び本人指定の親戚又は友人に告知し、かつ遅くとも24時間以内に本人を審問のため管轄法院に移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人又はその他の者もまた管轄裁判所に24時間以内に逮捕・拘禁機関に提審するよう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に規定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り、「違法の逮捕拘禁」を前提要件として提審を請求することではなく、よって提審法第1条は、「人民が法院以外の全ての機関によって非法の逮捕拘禁を受けたとき、本人或いはその他の者は逮捕拘禁の所在地方の法院或いはその管轄の高等法院に提審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規定していることは、「不法の逮捕拘禁」を提審の前提要件とするから、憲法の規定に違反するのである。

前述のように、刑事訴訟法及び提審法に関する憲法の趣旨に違反する条文は、全てこの解釈が公布の日から起算して遅くとも2年以内にその効力を失う。本院院解字第4034号解釈が変更されるべきである。但し、憲法第8



条第2項における「遅くとも24時間以内に移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にいわゆる24時間は、客観的、確かに捜査を進め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よって、本院釈字第130号の解釈は依然として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他の憲法規定の趣旨に符合する法律上の障害事由があるとき、自ずと時間の算入することを排除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合わせてここで説明する。



司法院釈字第436号解釈（1997.10.3）

本件の争点：軍事審判法の関連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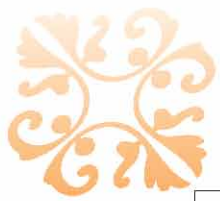
解釈は、軍事裁判は独立、公正な裁判機関としてその手続きを含め、法の適正な過程に合致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うえで憲法における司法権に関する制度建製の憲法原理に反してはならない。また人身の自由及び訴訟権を保障するために、平時に終審の軍事裁判機関による有期懲役以上の刑の宣告を受けた事件は、被告が判決の違背法令を理由として直接通常裁判所に救済を請求することを許可すべきである。軍事審判法と憲法の趣旨が合致せぬ規定は、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遅くとも2年を満した時に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行政院と司法院は本号解釈に応じるため、1999年3月29日に軍事審判法の改正共同草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立法院が同年10月1日に可決した後、総統は同年10月2日に「(88)華総(一)義字第8800234380号令」を以って同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改正・公布された軍事審判法は全文の改正をおこない、本号解釈の趣旨に従って軍事裁判機關を再建し、憲法における司法権に関する制度建製の憲法原理に合致するように、全部で合計8編238条からなるものである。総則編(第1編)における改正の骨子は、(1)軍法機關を地区制に改め部隊には隸属せぬものとし、(2)国防部には「地方」、「高等」、「最高」との三等級の軍事裁判所を設けるうえで、その組織及び管轄を明確に定め、(3)国防部の軍法行政事項に対する監督は、裁判権の行使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はならなくなり、(4)現役軍人とみなす範囲を縮小し、(5)現役軍人の定義を修正し、(6)軍法人員の身分保障等を強化し(以上は第1章から第3章)、(7)裁判と検察との分立を厳格に履行し、各級の軍事裁判所に配置する検察署の職権の独立行使を明確に定め(第4章)、(8)軍事檢察官による勾留權を撤廃し、これを軍事裁判所による権限へと移行し、並びに刑事訴訟法と照合し、人權保障の関連規定を増補し(第5章から第10章)、(9)特別に証拠の章を増補し、証拠裁判主義の機能を發揮するようにした(第11章)。その他、本来第11條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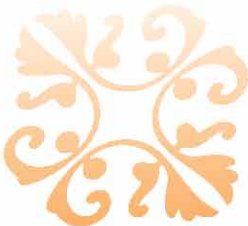




める國防部は最高軍事裁判機關、第13條及び第34條の士官參審、第133條の軍の長官の判決認可權及び再議權、第158條の裁判廷の組成に関しては軍の長官の認可を請求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等の規定を削除し、裁判の獨立を貫徹しようとした。



また捜査、起訴、裁判、上訴、抗告、再審、非常上訴、及び執行の手續き(第2編から第7編)については、すべて解釈の趣旨に従い、多くが改正された。その中で被告が直接通常裁判所に救済を請求することを許可すべきとする解釈の指摘に関しては、最高軍事裁判所による有期懲役以上の宣告を不服とする者、または高等軍事裁判所による死刑、無期懲役の判決の宣告を受けた者は、判決の違背法令を理由として、最高裁判所に上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した(第181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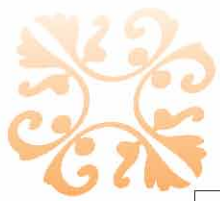




解釈文

憲法第8条第1項は、人民の身体自由は保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法院により、法定手続きによるのでなければ、人民を審問又は処罰してはいけな
いと規定しているし、憲法第16条も人民は訴訟の権利を有すると規定して
いる。現役軍人も人民である以上、これらの規定により保障されるべきであ
る。また、憲法第9条に、「人民は現役軍人を除き、軍事裁判を受けさせては
いけない」という規定は、現役軍人は国家を防衛する特別な義務があり、国
家の安全及び軍事に関わる事由に鑑み、彼らの犯罪行為に関して軍事裁判
といった特別な訴訟手続きを設けることとし、軍事審判機関が軍人の犯罪
に対し裁判権を独占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ある。但し、軍事審判の仕組みは
、憲法上明確な規定が定められていない以上、法律をもちこの手続きを規範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しても、軍事審判機関が行使したのは依然として国家の
刑罰権に属し、その発動および運用は正当な手続きの最低限の要求に符合
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例えば、独立・公正な裁判機関と手続きの構成や、憲
法第77条・第80条等における司法制度としての憲法原理の遵守や、軍人の
権利制限に及ぶ軍事審判の手続きを規定する法律は憲法第23条における





比例原則の遵守など。さらに、憲法の保障する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権利及び同77条の主旨に鑑み、平時であれば、軍事審判機関による終局判決で懲役以上の刑が言い渡された事件は、被告人が直接に普通法院に法律違反を理由として救済を求めることとすべきである。軍事審判法第11条・第133条第1項、第3項・第158条その他の被告人が直接に普通法院に判決は法律違反であるのを理由として救済を求めることを禁ずる規定が全て上述の憲法趣旨に反し、本解釈が公布された後、遅くとも2年以内効力を失う。所管機関は、上述の期間内、それらの原則に従いかかわる法律を修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訴訟上の救済のため審級制度を調整すること・審判独立を貫くため軍事審判に関する審検分離や審判に務める軍人の選任基準及び軍事裁判官としての身分保障なども改めて検討・修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合わせてここで説明する。





本件の争点：集会デモ法の関連規定は違憲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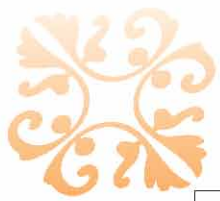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集会デモ法の集会不許可に関する一部要件の規定は、憲法が保障する表現の自由、集会の自由の趣旨に合致せぬものであり、すべて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行政院は本号解釈に応じるため、2000年10月17日に集会デモ法第6條、第9條、第11條等の一部改正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立法院は2002年6月4日に改正案を可決し、総統は同年6月26日に「(91)華総(一)義字第09100128080号令」を以って同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改正・公布された集会デモ法は、第9條第1項の但書を修正し、重大な緊急事態の預見は不可能であるための集会デモの申請に対しては、6日前という申請の制限を受けないとしたうえで、人民の偶発的な集会デモの自由を保障しようとし、修正された第11條の室外集会デモの不許可の状況に関する包括的な規定を具体的・明確化にしたほか、同条にあった共産主義または国土の分裂を主張するものは不許可とする規定を削除し、参加者の政治的意見を表現する自由を保障しようとした。





解釈文

憲法第14条に定められている人民の集会の自由は、憲法第11条に定められている言論、講学、著作及び出版の自由と同様に、表現の自由の範疇に属し、民主政治を実施するためのもっとも重要な基本人権である。人民の集会の自由を保障するために、国家は適切な集会の場所を提供し、集会デモ行進の安全を確保し、そして集会デモ行進を順調に進行させ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法律をもって集会デモ行進の権利を制限するに当たって、明確性原則及び憲法第23条の規定に合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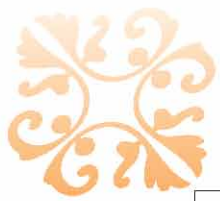
集会デモ行進法第8条第1項は、室外の集会デモ行進が同条項の但し書きに定められている各号の状況を除くほか、主管機関に許可を申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定めている。それに対して、同法第11条は室外集会デモ行進が同条に列挙された状況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以外に、許可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定めている。その中で、時間、場所及び方法に関する規定は集会デモ行進の目的または内容の事項に関わっていないため、社会秩序を維持し、公共利益を増進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り、立法による自由形成の範



囁に属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またこうした規定は表現自由が求めていることを侵害することはないのであり、憲法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ている集会の自由の趣旨にも抵触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

集会デモ行進法第11条第1号は、同法第4条の規定に違反することが許可を与えない要件にし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規定は、「共産主義または国土の分断を主張する」言論に対し、主管機関に集会デモ行進を実施する前に人民の政治上の言論について審査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り、憲法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ている表現の自由の趣旨に反するのである。同条第2号の規定は、「国家安全、社会秩序または公共の利益に危害を与える恐れがあると認めに足りる事実を有するもの」と定めている。第3号の規定は「生命、身体、自由または財貨に対する重大な損害を与える恐れがあるもの」と定めている。これらの規定は具体かつ明確性を欠いているため、集会デモ行進以前に明白かつ即時の危険の事実状況がなく、将来発生する可能性のみに頼って、主管機関によって集会デモ行進を同意するや否やを判断する根拠にしたの





であり、憲法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ている集会自由の趣旨に合致しない。よって本解釈が公布されてからこの条文は効力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

集会デモ行進法第6条が集会デモ行進の禁止地域を定めている目的は、国家重要な機関及び軍事施設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こと、対外の交通の順調を維持することにある。同法第10条は集会デモ行進の責任者、その代理人または秩序維持人員を定めている。第11条第4号は同一時間、場所、行進経路にすでに他人が申請し許可された場合を集会デモ行進の不許可の要件にすると定めている。第5号は法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または許可が取り消された、命令によって解散された団体が当該団体の名義で申請した場合、主管機関が集会デモ行進を許可しないことができると定めている。第6号は申請者に申請書における各事項を記入するよう命ずる第9条の規定に合致しなかった場合を不許可の要件にすると定めている。これらの規定は集会デモ行進活動を平和に進行するのを確保すること、そして、集会デモ行進活動が民衆の生活安寧への影響を回避することなどを目的にするのである。よってこれらの規定はすべて他人の自由への妨害を防止し、社会秩序または公





共利益を維持するために必要とするのであり、憲法第23条の規定に抵触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ただ、集会デモ行進法第9条第1項の但し書きは「自然災害またはその他予見できない重大事故にあい、正当な理由を有するものは、2日前に申請を提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定めている。しかし、こうした偶発的な集会デモ行進にとって、2日前までに申請しなければ許可を与えないという規定は憲法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ている人民の集会自由の趣旨に違反しているので、緊急に検討、改善を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集会デモ行進法第29条が解散及び制止命令に従わない首謀者に刑事責任を課することは、立法による自由形成の範囲に属して憲法第23条の規定に抵触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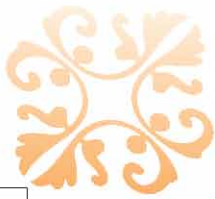
本件の争点：一方の意思による夫婦住所の決定に関する民法の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民法が夫婦の一方の意思による夫婦住所の決定に関する規定は、他方による住所の選択及び具体的事情による特殊的状況への顧慮がなされておらず、憲法の趣旨に合致せぬものであり、よって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遅くとも1年を満した時にその効力は失われ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立法院の一部立法委員は、先の1997年12月20日に民法親属編第1002条等の一部改正案を提出した。解釈が公布された後、立法院は解釈の趣旨に従い、1998年5月28日に改正案を可決し、総統は同年6月17日に「(87)華総(一)義字第8700121300号令」を以って同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修正公布された民法第1002条は、本来夫婦の一方の意思により住所を決定するとした規定を、夫婦の住所は双方共同の協議によりこれを定めると改正し、未協議或いは協議不成立の場合は、裁判所にこれの決定を申し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した。



解釈文

民法第1002条の規定により、妻は夫の住所をその住所とし、婿養子たる夫は妻の住所をその住所とするとしている。但し、夫が妻の住所をその住所とする、或いは妻が婿養子たる夫の住所をその住所すると約定する場合は、その約定に従うとしている。本条但書の規定では、夫婦双方に住所を約定する機会を与えているが、もしも妻或いは婿養子たる夫が約定を拒否し或いは双方による協議が不成立とな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は、すなわちその一方が設定した住所をその住所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前掲した法律は相手方による住所の選択および具体的事情の格別な状況を配慮しておらず、それが憲法上の平等原則および比例原則に尚も一致しないものであり、よって本解釈の公布日から、遅くとも1年を満時とし、その効力を失うものとするべきである。また、夫婦住所の設定と夫婦同居の義務の履行は尚も異なるところがあり、住所とはすなわちもろもろの法的効力を決定する中心地であり、民法が定める同居の義務を履行する唯一の場所ではない。夫婦はたとえ住所が未設定であっても、依然として永久に共同生活を目的とし、相互に同居の義務を履行する責任を負うべきであり、こうしたことは当然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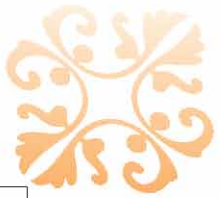
司法院釈字第457号解釈（1998.6.12）

本件の争点：退輔会「宿舍土地処理要点」の嫁に出た女子の相続禁止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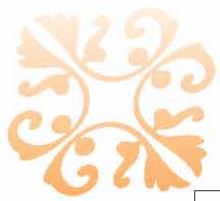
解釈は、国有農場の土地を耕作に配分された退役民は、その男子に限り、結婚の有無を問わずに、それを相続する権利が承認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女子が嫁に出た後は無条件で土地および宿舍のすべてが返還されるべきとしている規定は、男女平等の原則に相違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り、よって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6ヶ月以内に、これを検討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行政院国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会は1998年12月16日に解釈の趣旨に従い、「本会各農場の非独身場員死亡後その遺族による耕作相続申請の作業要点」を發布するうえで、「本会各農場の非独身場員の入院、入所または死亡による欠員後の宿舍土地処理要点」を廃止した。



上述の新規に發布された要点は解釈の趣旨に従い、耕作に配分された
退役民が死亡した後に、耕作相続により間接的に安置される遺族の範囲は
、特定条件下の配偶者、成年の子及び養子とすることを明確に定め(第3点)
、並びに本来の要点であった女子が嫁いだ後は無条件に配分を受けた耕地
は返還されるとしていた規定は削除された。





解釈文

中華民国人民は、男女の分別なく、法律上には一律に平等である；国家は両性の地位にかかる実質的な平等を促進すべきとすることは、憲法第7条と憲法増修条文第10条第6項に明文で定められている。国家機関は公の行政任務を遂行するために、私法のかたちでの行為であれ、前掲した憲法の規定を順守すべきである。行政院国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会が發布した「本委員会の各農場の家族を持つ職員に関する医療を受ける、公の扶養を受けるまたは死亡により空席になった後の房舎土地の処理要点」という命令は、もともと退役軍人及びその遺族の生活の面倒を見るために設置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して国有農場の土地を耕作するための配分(=配耕)は、退役軍人に対する特殊な優遇措置であり、それは一般国民が取得する権利または法律上の利益とは異なるものである。配耕を受けた退役軍人と国家との間には、使用貸借の法律関係が成立するのである。配耕を受けた退役軍人の死亡により貸借を目的とする使用が終了するときには、主務官庁は本来、国家資源





の合理的運用が得られるため、契約を解除して耕地を回収すべきである。主務官庁はもしも遺族の面倒を見るという特別な目的のために、もともと配分を受けた房舎及び土地を引き続き使用させるのであれば、遺族の範囲は子に及ぶべきか否か、そしてその生計能力、耕作能力を酌量しそのうえで、確実に補助を継続する必要があるか否かにおいては、男女平等の原則により妥当に企画されるべきである。前掲した房舎土地の処理要点の第4点第3項は、「死亡した職員の妻がもしも他人と再婚しまた子供がいない、あるいは娘のみがいる場合は、その娘が嫁に出た後は無条件で土地および房舎のすべてを回収すべきであり、もしも息子がいるならば息子がその権利を相続することを許可すべし」と定め、その中の規定は退役軍人の息子に限り、むしろ結婚しているか否かにかかわらず、すべてがそのいわゆる相続の権利を承認しており、これは前述の原則とは合致せぬものである。主務官庁は本解釈の公布日から6ヶ月以内に、前掲した解釈の趣旨に基づき、関連規定を検討し、妥当な扱い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本件の争点：銃砲条例の強制労働処分の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銃砲弾薬刃物管制条例」が一律に強制労働3年を宣告するとした規定は、その中に社会的な危険性を具えていない者の身体の自由が制限されている部分については、憲法の比例原則に合致しておらず、よって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これの適用を認めないという趣旨を宣言した。

本号解釈により、法務部は1999年1月26日に所管検察機関に通達し、本解釈が公布される以前に、銃砲弾薬刃物管制条例第19条第1項の規定に従って、強制労働3年の宣告が確定した事件には憲法の比例原則に合致するか否かを審査すべきであり、もしも合致せぬ場合は、その執行の免除或いは執行持続の免除を裁判所に申し立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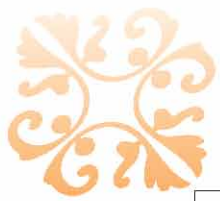


その他行政院も2000年11月14日に銃砲彈藥刃物管制条例第19条等の一部改正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

立法院は2001年10月31日に審議を完了し、総統は同年11月14日に「(90)華総(一)義字第9000223470号令」を以って、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修正公布された同条例は、本来第19条の保安処分の強制宣告という規定を削除した。





解釈文

国民の身体の自由を保障することは、憲法第8条によって明文化されている。人身の自由を制限する法律は、その内容が憲法第23条の要件を充た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保安処分は、処分対象者の教育と治療を目的とし、彼らの将来の危険性に基づいて身体や自由等を拘束する措置であり、刑罰を補充する制度である。法治国家における人権保障の原理および刑法の保護作用に基づき、法律規定の内容は比例原則に合致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保安処分の宣告は、行為者の行為の重大性、行為者が表した危険性、および行為者から将来の犯罪行為が予期せられる蓋然性に相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銃砲弾薬刀械管制条例(以下、銃砲刀剣類所持等取締法と呼ぶ)第19条第1項は、「第7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項から第3項まで、第13条第1項から第3項までの罪を犯し、有期懲役に処した者に対して、刑の執行完了後または赦免後に労働場所に入らせるかつ強制労働を命じる。その期間は3年とする。」と定めている。すなわち、行為者に対してその社会的な危険性を予防し矯正する必要があるか否かを問わずに、一律に3年の強制労





働に処する。その結果、社会的危険性のない処分対象者に対しても身体の自由を制限することとなり、手段と予防や矯正という目的との間に必要性が欠如し、憲法第23条の比例原則に抵触することとなる。つまり、銃砲刀剣類所持等取締法第19条の罪を犯し、行為者に対してその社会的危険性を予防や矯正する必要があるか否かを問わずに、一律に3年の強制労働に処する規定は、本解釈の趣旨に反しており、本解釈が発布される日から適用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また、行為者が前述した第19条第1項の罪を犯した場合、事案の状況により比例原則に合致したものは、当該規定に基づいて保安処分を科すこととするが、比例原則に合致しないが保安処分を科す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場合は、裁判所は刑法第90条第1項の要件に基づき、職権によりそれを命じることとする。なお、この場合、刑法第2条第2項を適用する余地がなく、第1項を適用することとなる。すなわち、裁判時法主義を原則とするが、行為後の法律により刑の変更があったとき、そのうちの軽い刑を適用することとする。



本件の争点：警察勤務条例における臨検実施の規定は違憲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臨検の実施手段は、人民の行動の自由、財産権及びプライバシーの権利に甚だしく影響を及ぼすものであるがゆえに、法治国家による警察の勤務原則に厳格に遵うべきである。現行の警察職務の執行に関する法規につき不完備があるものについては、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2年以内に、全面的に検討を行う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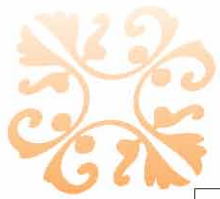
内政部所管の警政署は解釈が公布された後、即刻に解釈文を各警察機関宛にファックスを送り、臨検、路検、検問等の勤務を執行する警察官に、制服の着用並びに身分証明書の提示、勤務の事由の告知を行使すべきことを要求するとともに、臨検の要件及びその手続きに関しては、厳粛かつ謹慎に務めることを求め、法を執行する方法と態度を重んじ、勤務の品質を向上させるよう要求した。その他、「警察臨検実施作業規定」、「警察臨検実施標準作業手続」を制定し、更に明確な手続的依拠として提供し、そのうえで関連の講習会を挙行了した。



その他解釈が指摘する法規の不完備な部分については、立法院の一部立法委員が2002年5月29日に警察職権行使法の制定を提案し、行政院もまた同年12月13日に警察職務執行条例草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立法院は両法律案の合併審議をおこない、2003年6月5日に可決し、法律名を「警察職権行使法」とし、総統は同年6月25日に「(92)華総(一)義字第09200116580号令」を以って同法律を公布した。

制定公布された警察職権行使法は共に5章32ヶ條からなり、臨検実施の要件、手続及び違法な臨検に対する救済について、すべて明確な規範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る。法律はまず、その制定目的は警察に対して法による職務を行使させようとするところにあることを明確に掲げ、そのうえで警察が職権を行使するには必要限度を超えてはならず、侵害が最も少ない方法にてこれを行うべきであり、且つ制服の着用或いは身分証明書の提示により身分を表示すること、勤務の事由を告知すること等を規範化し(第1章)、次いで人民の身分調査及び資料収集の事項、突発的かつ危険的状态において即





時に強制を実施する事項については、その要件及び手続を明確に規範する(第2章、第3章)、末尾には人民は警察の職権行使にあたってその利益が侵害されたと思ふときの救済の権利を明確に定めている(第4章)。本法の公布は警察の職権行使を法制化するさきがけを創った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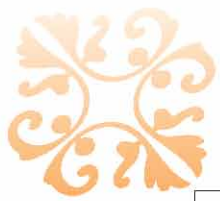


解釈文

警察勤務に関する法律(警察勤務条例)は、警察勤務の編制・組合せを規定し、勤務を行う方式も列挙するもので、単に組織法ではなく、実は行為法の性質を兼ねている。同法律第11条3号によると、職務質問は確かに警察の行う勤務の一種である。職務質問の方法としての、検査・自動車検問・取締りもしくは尋問などいかなる名称に問わず、全て対人または対物の取調べ・干渉で、人民の行動自由、財産権及びプライバシーなどに対する影響が重大であり、法治国家としての警察勤務の原則に遵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職務質問を行う要件・手続き及びその違法行為に対する救済は、すべて法律による明確な規範を有するとすべきである。これにより、憲法の保障する人民の自由・権利との趣旨に符合するといえる。

この法律に関する職務質問との規定の趣旨は、警察官に時間・場所及び対象を問わず、みだりに職務質問したり、取り締まったり、検査・尋問したりする権限を与えているものではない。法律による規定を有すことを除き、場





所に対し警察官の職務質問を行うのは、危害が起こっている、客観的・合理的な判断で危害が起こりやすい地点・交通用具もしくは公共施設に限りであり、またその場所は私人が住居に使わ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れば、住宅と同じように保障されるべきである。人に対し警察官の職務質問を行うのは、その行為は危害を起し、もしくは起こそうとしていると認められるに足りる相当な理由があるかぎりであるし、比例原則を遵守すべく、必要の程度を超えてはいけない。さらに、警察官の職務質問を行うまえ、当該場所にいる人に実施の理由を告知し、証明書を提出して職務の執行にあたっている者を示す。職務質問を行うときは、その場で実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人の同意を得るとか、またはその人別を確認するのが不可能とか、もしくは現場で実施したら本人に対して不利であり交通・秩序の妨害になると考えた場合でなければ、警察署・派出所に同行を求めてはいけない。その過程で、違法な事実を発覚したら、法定の手続きに基づき処理するほかに、人別を明らかにした後、その場に去ることを許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たがって、前掲の法律第11条第3号の規定は前述した解釈の主旨に一致するように適用されれば、憲法の人権を保障する主旨に悖らないといえる。現行法における警察官の職務を執





行する規範は欠如しているので、関わる行政機関は、本解釈が公布してから2年以内解釈の主旨に従い、社会の実際状況も斟酌し、警察官の勤務を執行したとき突如の出来事に対応できる権限を付与し、人民の自由と警察自身の安全との維持を均衡できるよう法律を整備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合わせてここで説明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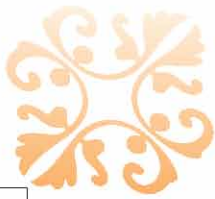


本件の争点：組織犯罪条例における「犯罪組織への参加」とは何か？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犯罪組織に参加する行為が依然として継続しているか否かについて、検察官は立証の責任を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参加の行為が発覚される前に自首してきた、或いはすでに長期間にわたって組織との連絡を絶っており、また組織の活動等にも参加していないといった事実があり、それによって犯罪組織から既に脱離したことを証明するに十分であるのであれば、すなわちそのものは尚も参加を継続していると認められないのであり、よって関連の解釈は変更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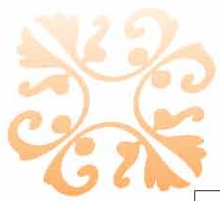
司法院积字第68号、第129号及び院字第667号解释においては、犯罪組織の参加が継続しているか否かについて、及び立証責任の分配に関する解釈において、本解釈の趣旨と合致しない部分は変更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解釈文

犯罪組織の存在は、法益に侵害を与えるおそれがあるため、それを排除し、予防する必要がある。組織犯罪防制条例(以下、組織犯罪法と略す)は、組織的に行われている犯罪活動を予防し、社会秩序の維持と個人法益の保障を実現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同法第3条第1項及び第3項における「犯罪組織に参加する」こととは、組織活動に参加するか否かを問わず、犯罪組織に入り組織のメンバーになることで直ちに犯罪が成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なお、犯罪行為が継続しているか否かについては、組織的活動を持続的に参加しているか、または組織と連絡を保っているかによって判断されるべきであり、国家を代表して犯罪を訴追する検察官が犯罪の挙証責任を負うべきである。組織のメンバーは、犯罪組織への参加が発覚する前に自首した場合、若しくは長期間組織と連絡せずかつ活動にも参加しておらず、よって犯罪組織から離脱したと証明できる場合には、犯罪組織に参加していると認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れに対し、大法官解釈第68号の前半において





次のように説示されている：「叛乱組織に参加した者は、自首若しくは他の事実により組織を離脱したと証明できるまで、組織に参加し続けていることと認定する」。しかし、第68号解釈の前半は、すでに廃止された「懲治叛乱条例」についての解釈であるため、現に犯罪組織に参加しているか否かの判断や挙証責任の分担に関して、本解釈(訳者注：第556号)の趣旨と一致しない部分については、第68号解釈及びそれと同じ趣旨の他の解釈(院字第667号、釈字第129号)を変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また、組織犯罪法第18条第1項に規定されている経過期間について、その適用は本解釈の趣旨に反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憲法による人身自由の保障に反するものでもないことを併せて明記しておく。





本件の争点：民法及び判例が子の父への嫡出否定の訴えを禁ずることは違憲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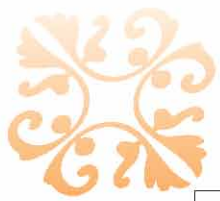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子はその血統の來源を知り得て、真実の父子の身分關係を確定することは、子の人格權と深く関わることであり、憲法の保障を受けるべきであり、民法には子の父への嫡出否定の訴えを提起し得ること及び当該訴訟の提起の期間とその起算日が規定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は、憲法が人格權及び訴訟權を保障する趣旨に合致しておらず、改善を検討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本号解釈公布の後、行政院と司法院は2006年4月20日に民法親族編第1063條等の一部改正共同草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同年4月19日に一部立法委員も関連の改正案を提出した。その後、立法院はこれらの案を合併審査し、2007年5月4日に審議を完し、総統は同年5月23日に「(96)華総(一)義字第09600064111号令」を以って、改正案を公布した。

改正・公布された民法第1063条は、子にもその嫡出性を否定する訴えを提起する權利を付与するとした(第2項)。





解釈文

子が自らの血統の由来を知り、真実の父子という身分関係を確定することは、子の人格権に深く関わり、憲法により保障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民法第1063条は「妻の受胎が、婚姻関係の存続中に係るものであるときは、その生まれた子は、これを婚生の子と推定する。前項の推定は、夫婦の一方が、妻は夫によって受胎したの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できるときは、その否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但し、子の出生を知った日から1年以内に、これ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規定しており、これは身分の安定及びに子の利益を共に配慮するために設けられたものではあるが、そうした否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者は夫婦の一方のみに限られており、子自身は否認の訴えを独自に提起する資格がないのみならず、さらには子が当該否認の訴えを独自に提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時に設けられるべき合理的期間及び起算の日が考慮されておらず、故に前掲した規定は子の訴訟権に不当な制限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子の人格権への保護が欠如することとなり、こうした範囲の内は憲法が保障する人格権および訴訟権の趣旨に合致し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最高法院23(1934)年上字第3473号及び同院75(1986)年台上字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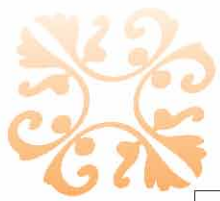




2071号の判例がこの趣旨に合致していない部分は、再度に引用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関係官庁は適時のうえで父性否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主体や起訴の除斥期間の長さ及びそれを算出する日等に関する規定への検討をおこない、これらを前掲した憲法の趣旨に合致するようにするべきである。

確定終局判決が適用した法令または判例に関しては、本院(司法院)が人民の解釈申立を経てそれが憲法の趣旨に合致していないと判断した場合には、その不利益な確定終局判決を受けた者は当該解釈を依拠に法的手続によって救済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は、既に本院釈字第177号、釈字第185号で解釈したところである。本件申立人はもしも再審の訴えによる救済が不可能である場合は、本解釈の公布日から1年以内に、法律で推定された実の父を被告として父性否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許可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その訴訟の手続は、親子関係事件手続の中における否認の訴えの部分に関する民事訴訟法の関連規定を準用し、ひいては法定代理人が代わりに





起訴する場合には、子の利益のためにこれをおこなうべきである。

実の父が推定された他人の婚生の子に対して否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を法律で禁ずることは、訴訟により他人の婚姻の安定、家庭の平和及び子女の養育を受ける権利へ影響を及ぼし破壊されないようにと定め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こうした規定は憲法に尚も抵触していない。ひいては将来立法が
かような訴訟にかかる制限を緩和するか否かに至っては、立法による政策形成の自由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る。





司法院釈字第603号解釈 (2005.9.28)

本件の争点：戸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の指紋押捺を身分証明書の発行要件とした規定は違憲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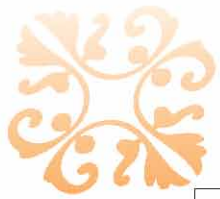
解釈の要旨及びそれらによる法令の改正状況

解釈は、指紋とは重要な個人情報であり、情報のプライバシーの権利の保護を受けており、戸籍法における強制に等しい押捺並びに指紋の記録・保存に関する規定は、憲法の趣旨に合致せぬものであり、すべては本解釈の公布日より、適用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趣旨を宣告した。

戸籍法第8條に関しては、行政院はかつて2005年4月11日に第2項、第3項を削除する改正案を提出し、立法院の審議を付したが、ただし立法院はそれを否決した。

本号解釈の公布の後、内政部は即時に解釈の趣旨に従って、戸籍法施行細則(行政命令)第22條の指紋押捺の関連規定を削除し、そのうえで指紋押捺を身分証明書の全国的更新の要件とする関連作業規定を削除した。よって、2005年12月21日から開始された身分証明書の全国的更新の作業においては、指紋押捺は行われていない。





上述した戸籍法第8條第2項、第3項の改正案は、その改正の方向(第2項、第3項削除)と本号解釈の趣旨に合致しており、解釈の公布後には、内政部は基本的人権の保障を基づき、改正案の審議について積極的に立法院との協議をおこな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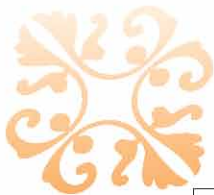


解釈文

人間の尊厳を守り、自由な人格の発展を尊重することは、自由民主の憲政秩序の核心価値である。プライバシーは、憲法によって明確に規定された権利ではないが、人間の尊厳の尊重・個人の主体性の維持・人格の完全な発展を配慮し、私生活に対する他人の騒擾からの回避および個人的情報の自主管理を保障するためには、不可欠な基本権利であり、憲法第23条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ている(本院釈字第585号解釈参照)。個人的情報の自主管理という情報プライバシーは、個人的情報を明かすか否か、明かすとすれば、いかなる範囲内で、いつ、どのように、誰にそれを明かすのかという決定権、個人的情報の被用に対する国民の知る権利と制御権、および誤った情報の記載に対する訂正権を保障す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しかしながら、情報プライバシーに対する憲法の保障は、絶対的なものではなく、憲法第23条の趣旨に即して国が明確な法律の規定でそれを適切に制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指紋は重要な個人的情報であり、個人による指紋情報の自主管理は情報プライバシー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る。また、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を交付する





か否かは、国民の基本権利の行使に直接的に影響を及ぼす。「戸籍法」第8条第2項によれば、「前項の規定に従って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の交付を申請するときは、申請者が指紋を押捺し、交付機関がそれを記録して保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但し、申請者が14歳未満である場合、指紋押捺をさせず、申請者が満14歳になったとき、改めて指紋押捺をしてもらい、それを記録・保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同条第3項は「前項の規定に従って指紋押捺をしない申請者には、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を交付しない」と定めている。前記規定に従って指紋押捺をしない者に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を交付しないことは、指紋押捺および指紋の記録と保管を強制し、それを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を交付する要件とするにほかならない。その目的の如何に関して、戸籍法に明文の規定が欠如しているのは、国民の情報プライバシーを保障する憲法の趣旨に反するというべきである。また、身分証明カードの偽造防止、成りすまし受領や盗用の防止、行き倒れ・認知症徘徊者・氏名不明死亡者の身分確認などの目的から考えても、指紋押捺という方法は、損得の均衡性がならず、行き過ぎであり、比例原則にも反する。よって、指紋押捺の強制および指紋の記録・保存を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の交付の要件とする戸籍法第8条第2項、





第3項の規定は、憲法第22条、第23条の趣旨に反し、本解釈が公布される日からその効力を失う。また、戸籍法のその他の規定に基づく国民身分証明カードの切り替え作業が、予定通り続けられるのはいうまでもない。

特に重大な公の利益のため、国民の指紋を大規模的に収集・記録し、データベースを作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場合、国は収集の目的を法律で明確に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も指紋の収集自体は、重大な公の利益という目的の達成と密接な必要性・関連性を有し、明確な規定でその目的以外の使用を禁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国民の情報プライバシーを保障する憲法の趣旨に符合させるために、主務機関は、そのときの科学技術に基づいて、情報の正確さと安全性を確保できる方法を用い、組織的にも方法的にも収集した指紋のファイルを厳正な措置で管理・保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